



第六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9(a)

可持续发展：《21 世纪议程》、《进一步执行
〈21 世纪议程〉方案》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

具有承受力的人类、具有复原能力的地球：值得选择的未来

秘书长的说明

1. 2010 年 8 月，根据 2009 年 9 月 22 日举行的气候变化问题首脑会议表达的意見，并在气候变化与发展委员会编写的题为“消除差距”的报告的鼓舞下，我设立了全球可持续性問題高级別小组，由芬兰总统塔里娅·哈洛宁和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担任共同主席。高级別小组包括另外 20 位来自世界各国的杰出人士，他们以专家身份参与，并不代表下文括号中所示的国家和组织：Sheikh Abdallah Bin Zayed Al Nahyan(阿拉伯联合酋长国)、Hajiya Amina Az-Zubair(尼日利亚)、Ali Babacan(土耳其)、James Laurence Balsillie(加拿大)、Alexander Bedritsky(俄罗斯联邦)、Gro Harlem Brundtland(挪威)、Micheline Calmy-Rey(瑞士)、Julia Carabias Lillo(墨西哥)、Gunilla Carlsson(瑞典)、Luisa Dias Diogo(莫桑比克)、Han Seung-soo(大韩民国)、Yukio Hatoyama(日本)、Connie Hedegaard(欧洲联盟委员会)、Cristina Narbona Ruiz(西班牙)、Jairam Ramesh(印度)、Susan E. Rice(美利坚合众国)、Kevin Rudd(澳大利亚)、Freundel Stuart(巴巴多斯)、Izabella Mônica Vieira Teixeira(巴西)和 Zheng Guoguang(中国)。
2. 我请高级別小组思考并提出可持续增长和繁荣的新愿景，并拟定实现这一愿景的机制。我还请高级別小组成员展现胆识，思维“不落窠臼”，以便提出的建议能够在实践中产生实质作用。
3. 我现在高兴地向会员国转递高级別小组题为“具有承受力的人类、具有复原能力的地球：值得选择的未来”的报告。人类在 21 世纪面临众多相互关联的挑



战，该报告提出了在此背景下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框架。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 1987 年 8 月提交了题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A/42/427)，其中提出了以综合方式处理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环境可持续能力的范式。高级别小组的报告完全支持这一范式，并提出一系列建议来推进高级别小组提出的愿景，即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现象，实现包容性增长，使生产和消费更具可持续性，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尊重一系列其他地球极限(见高级别小组的报告)。

4. 高级别小组提出的建议按三大主题分列：增强人民作出可持续选择的能力、努力实现可持续经济及为支持可持续发展加强机构治理。高级别小组共提出 56 项建议，其中许多建议是向各国政府提出的，一些建议是向私营部门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出的，还有一些建议是向各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及其秘书长)提出的。

5. 高级别小组出色完成工作，我对整个报告及报告中供会员国审议的建议表示赞扬。我尤其是完全支持高级别小组提出的处理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的综合做法。理念、政策、做法和机构方面的各自为政情况，是产生执行差距的主要原因，而且我们都承认，这一差距目前存在于可持续发展领域。我们若要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失业、全球金融危机等多层面挑战，就必须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做法，对各种相互关联有着更加完整的认识。

6. 我将仔细研究高级别小组的所有建议，并就向我个人提出的建议采取相应的具体行动。其中一些建议涉及我已经启动的各种举措，包括“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举措和联合国系统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已公开表示，可持续发展是我第二个任期内的首要任务。高级别小组向我提出的定期召开世界各国政治领导人和其他可持续发展利益攸关方会议的建议与此是完全一致的。我打算进而落实关于支持制定新的可持续发展指数或一组指标以及制定一整套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建议。关于提交全球可持续发展前景定期报告的要求，我认为这样一份报告很有价值，并将探讨落实方式，包括是否有资源采取这一重大而又雄心勃勃的举措。最后，我将努力进一步加强全球科学界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同时探讨如何将最新科学纳入决策。

7. 我作为秘书长和联合国各实体将随时按照会员国的要求，协助在国家、区域和全球一级执行高级别小组向会员国提出的建议。我鼓励会员国完全彻底地审议这些建议，并将那些时机成熟、可以立即作出决定的建议载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的成果文件——这份成果文件目前正在谈判中。当然，在全球一级作出结构调整是会员国的特权。我敦促各国政府审视现有机构和进程的缺点，考虑新设一个全球架构或改革已有全球架构，以便拥有一个新的开端。这个全球架构将综合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并汇集所有相关行为体。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科学界以及国家以下一级和区域一级主管部门的实质性参与，是开展适当讨论、作出正确决定并在实地贯彻执行的必要条件。

8.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用最终建设具有可持续能力的世界这一愿景，在世界各地动员民众支持并激励公民参与，因为具有可持续能力的世界才可以保障人类福祉，为子孙后代维护地球的存在。我希望，所有各方将支持高级别小组发出的具有承受力的人民和具有复原能力的地球呼吁，作出共同努力，将这一愿景化为现实。

2012年1月30日全球可持续性高级别小组共同主席给秘书长的信

我们荣幸地向你提交全球可持续性高级别小组题为“具有承受力的人类、具有复原能力的地球：值得选择的未来”的报告。

在全球处于动荡不定之际，我们受托编写这份报告。各个经济体步履维艰。不平等状况正在扩大。全球气温继续上升。我们正在考验地球供养人类的能力。各国和多边论坛没能就决定性协调行动达成一致，而且各方就财政支助所作的承诺也没有兑现，因此，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及其他社会和经济目标而作的努力受到阻碍。

前进的方向是明确的：我们应从如何思考我们彼此间的关系、与子孙后代的关系以及与维持人类生态系统的关系入手，进行大力度变革。我们高级别小组的任务是思考并提出可持续增长和繁荣的新愿景，并拟定实现这一愿景的机制。

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口现已达到 70 亿，因此，思考我们目前要走的道路，正逢其时。今天我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如果继续走同一条道路，那么人类和我们地球所面临的风险就会大增。我们认为，另外一条道路为我们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机遇，但我们必须坚定勇敢地踏上这条道路。变革之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认识到，如果沿着一条更可持续的道路走下去，将会增进人类福祉，促进全球正义，加强性别平等，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上的维生系统。

里约地球首脑会议已经过去近 20 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切合现实需要。今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同属一个议程：可持续发展议程。如果不能在所有方面取得进展，那么我们在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取得持久进展。

我们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愿景是以人为本的。我们在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核心建议，这些建议如逐步得到落实，将有助于让人类众多群体摆脱有辱尊严的贫穷；增强复原能力；加强全球公平，包括性别平等；改变我们进行商品和服务估值及衡量增长的方式；维护宝贵的生态系统；加强各部门和各机构之间的协作、协调和问责；建立促进全球可持续能力的共同框架。

到 2030 年，今年初生的儿童将长大成人。我们的建议力求为儿童、为所有儿童建立一个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增长，以较少投入提供更多产出，能造福所有人的世界。

我们把报告提交给你，但我们的建议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公民——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地方市长到工商界主管、科学家、宗教领袖、民间社会活动人士、尤其是如今还是青年人的下一代领导人——作出承诺，并采取行动。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解决问题。

我们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普遍愿望，因此我们的建议可以在不同国情背景下实施。执行工作必须基于并超越目前已有的协定和相互承诺。

我们的建议来源于我们在政府部门、决策机构、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等公共和私营领域的共同亲身体会。全部加在一起，我们处理报告所述问题方面的经验共有数十年的时间跨度。

秘书长先生，我们谨代表高级别小组向你表示深切谢意，感谢你对高级别小组以及更重要的是对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坚定支持和承诺。我们与联合国系统官员、会员国代表团和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了广泛协商。对于他们给予的支持和提出的建议，我们也表示感谢。我们还要感谢高级别小组成员，他们为完成小组的任务，慷慨奉献了自己的时间、经验和真知灼见。秘书处为支持本小组的工作作了巨大努力，在此一并表示深切感谢。

共同主席

塔里娅·哈洛宁(签名)

共同主席

雅各布·祖马(签名)

具有承受力的人类、具有复原能力的地球：值得选择的未来

秘书长全球可持续性高级别小组的报告

“地球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无法填平每个人的欲壑。”

圣雄甘地

摘要

愿景：一个值得选择的未来

25年前，布伦特兰报告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新范式。该报告认为，通过一个包含所有三大支柱的综合政策框架，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自那时以来，世人对我们所面临的相互关联挑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并意识到可持续发展为人们选择自身未来提供了最佳机遇。全球可持续性高级别小组认为，假如在行动的代价和不作为的代价两方面都作到透明，那么政治进程就可以汇聚为实现可持续未来采取行动所必需的论据和政治意愿。高级别小组的长远愿景是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现象，实现包容性增长，使生产和消费更具可持续性，同时也应对气候变化，尊重一系列其他地球极限。有鉴于此，本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推动实现高级别小组为维护地球可持续性、实现社会公正和促成经济增长提出的愿景。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进展

可持续发展不是终点，而是一个适应、学习和行动的动态过程。它是认识和了解各种相互关联性特别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联性并就此采取行动的过程。世界仍未走上这条道路。虽然已经取得进展，但进展的速度和深度都还很不够，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采取影响更深远的行动。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着日益强大的变革驱动力量，包括当前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资源匮乏、创新、人口结构变化、全球经济变化、绿色增长、日益不平等、不断变化的政治动态和城市化等带来的影响。

使民众更有力量作出可持续选择

我们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越大，对地球的潜在影响就越大，我们以可持续方式行事的责任也就越大。今天，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真实性，因为全球化和自然资源所承受压力意味着，个人的选择可能带来全球性后果。然而，对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而言，问题并不在于不可持续的选择，而在于本来就没有选择。只有在人权、基本需求、人类安全和人类复原能力得到保障后，才可能有真正的选择。优先行动领域包括：

- 确保具备发展的基本要素：国际社会对消除贫困、促进人权和人类安全及促进性别平等作出承诺
- 推动教育以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推动中学和职业教育，并建设各种技能以帮助确保全社会都能促进形成解决方案，以应对当今的挑战，抓住各种机遇

- 创造就业机会，特别是为妇女和青年创造就业机会，以推动绿色和可持续的增长
- 让消费者能够作出可持续选择，提倡负责任的个人和集体行为
- 管理资源并促成二十一世纪绿色革命：农业、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能源和技术及国际合作
- 通过健全安全网、减少灾害风险及进行适应规划，建设复原能力

努力建设可持续经济

要实现可持续性，我们就必须改变全球经济。只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修修补补是不行的。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使许多人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的成效产生质疑，但同时也为重大的改革提供了机遇。这场危机让我们有机会更果断地转向绿色增长——不仅在金融体系而且在实体经济中。有必要在一些关键领域采取政策行动，其中包括：

- 在商品和服务的监管和定价中纳入社会和环境成本，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 建立能起刺激作用的路线图，从而在投资和金融交易中日益重视长远可持续发展
- 增加用于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资金和伙伴协作，以调动大量新资金
- 制定可持续发展指数或指标，以扩展我们衡量可持续发展进展情况的方式

加强机构治理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建立有效的机构框架和决策进程。我们必须解决以下问题：围绕单一议题“筒仓”建立各自为政的机构产生了遗留问题；缺乏领导能力和政治空间；在适应各种新挑战和新危机方面缺乏灵活应变能力；常常不能对各种挑战和机遇作出预测和规划——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决策和实地交付。要在国家和全球两级改善治理、连贯一致性和问责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各优先领域采取行动，其中包括：

- 在国家以下以及在国家和国际各级加强连贯一致性
- 制定一套可持续发展目标
- 建立定期全球可持续发展展望报告制度，以汇总目前分散于不同机构的信息和评估意见，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
- 为振兴和改革国际体制框架作出新承诺，包括考虑设立全球可持续发展理事会

结论：呼吁采取行动

当前亟需积极采取贯彻落实行动。高级别小组期待秘书长落实属于其职权范围的建议，并向整个联合国大家庭提出全套建议。高级别小组还期待秘书长和联合国利用联合国的号召力，向各级政府、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科学界和私营部门等广大国际社会的其他利益攸关方推介这些建议。

目录

	页次
一. 高级别小组的愿景	13
二. 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进展	17
A.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	17
B. 变革的驱动因素	22
三. 增强人民作出可持续选择的能力	28
A. 满足基本要件	29
建议 1 至 3	30
B. 教育和技能促进可持续发展	31
建议 4 至 6	32
C. 创造就业机会	32
建议 7 至 10	33
D. 扶持性的可持续选择	34
建议 11 至 14	37
E. 管理资源和带动 21 世纪绿色革命	37
建议 15 至 22	38
F. 建设复原力	44
建议 23 至 26	45
四. 努力实现可持续经济	46
A. 包含社会和环境成本：监管和定价反映外差因素	47
建议 27 至 29	53
B. 制作一张日益重视长期目标的奖惩路线图	53
建议 30 至 33	55
C. 建立伙伴关系，发挥新投资的杠杆作用	56
建议 34 至 38	58
D. 建立衡量进展的共同框架	58
建议 39	59

五.	加强机构治理	59
A.	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协调和问责	60
	建议 40 至 44	62
B.	区域和全球各级的协调和问责	63
	建议 45 至 47	65
C.	可持续发展目标	65
	建议 48 至 49	66
D.	全球可持续发展展望	67
	建议 50 至 51	68
E.	加强国际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	68
	建议 52 至 56	69
六.	结论：呼吁采取行动	70
附件		
一.	建议清单	72
二.	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成员	79
三.	工作范围	81
四.	筹备官员和顾问	83
五.	秘书处	86
六.	会议、有关协商和活动	87
方框		
1.	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成效	17
2.	人类安全运作空间	23
3.	调动利用技术和创新：马斯达尔	24
4.	平等意味着生意	33
5.	需要更可持续的饮食	35
6.	公司向前迈进	36
7.	莫桑比克的粮食-能源企业	39

8. 大堡礁：可持续地管理自然资源	40
9. 能源供应和减排方面的公私伙伴关系	42
10. Red Eléctrica 公司智能网	43
11. 《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	44
12. 在阿尔卑斯山使用铁路并实行车辆收费：转向可持续的货物运输	47
13. 越来越多地利用排放交易	48
14. 绿色补贴	50
15. 大韩民国绿色政府采购战略	51
16. 气候变化筹资高级别咨询小组计算的创新性筹资来源，2020 年估计数	52
17. 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自愿参与可持续性报告	54
18. 挪威的可持续发展治理	60
19. 政策协调机制	61
20. 波罗的海的多个利益攸关方合作	64
鸣谢	89

一. 高级别小组的愿景

1. 今天，我们的地球和我们的世界正处于最好的时期，也正处于最坏的时期。全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地球也承受着空前的压力。世界上贫富不均正在加剧，有 10 亿多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中。在许多国家，抗议浪潮不断高涨，反映人们普遍向往建立一个更加繁荣、更加公正和更可持续的世界。
2. 每天，个人、工商企业和政府要作出数以百万计的选择。我们的共同未来寓于所有这些选择之中。全世界面临着各种相互重叠的挑战，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采取行动，支持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各项原则。采取真正的全球行动，让民众、市场和政府能够作出可持续选择，现在正是时候。
3. 25 年前就已明确提出，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融为一体。现在正是完成此举的时候。变革的机遇是巨大的。在客观、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动力面前，我们并不是被动无助的受害人。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
4. 我们面前的挑战是巨大的，但我们如果以全新的眼光审视旧有的问题，就会发现，新的可能性也同样巨大。这些可能性包括那些能够使我们从地球极限后退的技术；那些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产品和服务所带来的新的市场、新的增长和新的就业机会；那些能够真正使人们摆脱贫困的新的公共和私人筹资办法。
5. 究其根本，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一个让人们有机会影响未来、主张权利和表达关切的问题。让人们能够作出可持续选择的关键先决条件是民主治理和充分尊重人权。世界各族人民决不会容忍环境继续遭到破坏，也决不会容忍那种践踏人们所珍视的社会正义普遍原则的不平等现象继续存在。各国公民将不再容许政府和公司身为全人类可持续未来的监护者，却违反与公民所签订契约的行为。广泛而言，世界各地国际、国家和地方治理机构必须全面接受可持续发展未来的要求，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也须如此。同时，必须鼓励地方社区坚持积极参与可持续性政策的构想、规划和执行。这方面极其重要的是，必须让年轻人参与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
6. 因此，全球可持续性高级别小组的长远愿景是：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现象，实现包容性增长，使生产和消费更具可持续性，同时也应对气候变化，尊重一系列其他地球极限。这一愿景重申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 1987 年以“我们的共同未来”为主题提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联合国文件 A/42/427，附件)，即人们所熟知的布伦特兰报告。
7. 但是，如果要为世界人民和地球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必须认清这一挑战的方方面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引发这一挑战的因素包括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生产和消费的模式及人口增长的影响。全球人口到 2040

年将从 70 亿增加到近 90 亿，中产阶级消费者人数在今后 20 年将增加 30 亿，因此，资源需求将成倍增长。到 2030 年，世界粮食需求将增加至少 50%，能源需求将增加 45%，供水需求将增加 30%——这一切都发生在由于环境极限而必须对供应作出新限制的时候。环境变化尤其如此，因为它影响到人类和地球健康的所有各方面。

8. 当前的全球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我们不可再推定，随着环境阈值遭突破，我们的集体行动不会打破平衡，从而引发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破坏的风险。与此同时，不应以这些阈值为借口，对那些寻求脱贫的发展中国家规定武断的增长上限。诚然，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可持续发展的两难困境，就会使 30 亿人类大家庭成员面临终生贫困的危险。这两种结局都不可接受，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新的前进道路。

9. 25 年前，布伦特兰报告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将此作为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经济可持续性的新模式。该报告认为，通过订立包含所有三大支柱的综合政策框架，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布伦特兰报告在当时是正确的，而今依然正确。问题在于，可持续发展在 25 年之后依旧是一个普遍认同的概念，并没有成为每天在实地存在的客观现实。高级别小组曾经自问：情况何以如此？现在应当如何加以改变？

10. 高级别小组的结论认为，有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两种方案都是正确的，而且相互关联。缺乏政治意愿无疑损害到可持续发展。虽然很难提出反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理由，但如果我们的政策、政治和制度都不合比例地奖赏短期行为，那就没有什么可以鼓励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换言之，政策红利是长期性的，常常需要几代人才能实现，而政治挑战却常常就在当前。

11. 对于可持续发展为何尚未付诸实施这一问题，还有另外一种解答。这是我们据理力争的一种解答：可持续发展概念尚未被纳入国家和国际经济政策辩论的主流。大多数经济决策者仍然认为，可持续发展不属于宏观经济管理和其他经济政策部门的核心责任。然而，把环境和社会问题融入经济决策，却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12.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社会活动人士和环境科学家完全是在各说各话——近乎于使用不同的语言或至少是使用不同的方言。联合各学科、促成一种超越对立阵营的可持续发展共同语言，这一时刻已经到来；换言之，将可持续发展模式纳入主流经济学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样，政治人士和决策者就会发现，忽略可持续发展将难得多。

13. 高级别小组之所以认为，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需要一些人所说的“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原因就在于此。例如，这意味着：大幅改善环境科学和政策之间的联系；认识到在气候变化等某些环境领域存在“市场失灵”问题，需要

对其进行监管并进行经济学家所说的“环境外在因素”定价，同时明确指出采取行动和不作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代价；认识到创新、新技术、国际合作和投资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和创造进一步繁荣十分重要；认识到应商定一种做法，以便对长期社会排斥（例如，排斥妇女参与劳动力大军）的经济代价进行量化；认识到单靠私营市场可能无法建立妥善应对粮食安全危机所必需的规模；需要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私营公司对照已商定的可持续性措施，报告其每年的可持续发展绩效。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这对于政治本身是一种核心挑战。除非政治进程同样能够接受可持续发展模式，否则就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14. 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所需要的投资、创新、技术开发和创造就业在规模上超出了公共部门的范畴。因此，高级别小组认为，应利用经济力量来推动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增长，并在创造价值方面超越狭隘的财富观念。市场和创业精神将成为决策和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力。高级别小组向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提出了一项挑战：更好地合作解决共同问题，增进共同利益。要想实现飞跃性变化，有意愿的行为体就必须携手建立前瞻性联盟，带头为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15. 高级别小组认为，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采取新做法，我们将会把可持续发展模式从全球经济辩论的边缘带入主流。这样，行动的代价和不作为的代价都会变得透明。只有到那时，政治进程才能够汇聚为实现可持续未来采取行动所必需的论据和政治意愿。

16. 高级别小组呼吁对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采取这一新做法，以便用全新的行动方式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性是不言自明的。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要说明可持续发展也是合理的，而不作为的代价远远超过采取行动的代价。

17. 为了推进我们建立可持续地球、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增长的愿景，高级别小组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

(a) 我们必须承认粮食、水和能源之间的相互关联，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不同的“筒仓”。如果我们要解决全球粮食安全危机，就需要把所有三个要素完全融为一体，而不是单独对待。支持进行第二次绿色革命——一次“常青革命”，从而在各项可持续性原则基础上让产量翻番，现在正当其时；

(b) 现在需要作出大胆的全球性努力，包括采取重大的全球性科学举措，以加强科学和政策之间的联系。我们必须借助科学来阐明科学家所说的“地球极限”、“环境阈值”和“临界点”。应该优先处理海洋环境和“蓝色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

(c) 今天所销售的大多数货物和服务没有承担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环境代价和社会代价。我们应以科学为基础，逐步就这些代价的适当定价方法达成共识。计算环境所涉外部因素的代价可以为绿色增长和绿色就业创造新的机遇；

(d) 在消除社会排斥和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公正的时候也需要对其进行衡算、计算其代价并为其承担责任。下一步是探索我们如何处理这些重大问题，为所有人带来更好的结果；

(e) 有必要把公平作为首要问题。发展中国家在朝着可持续发展方向过渡时，既需要时间也需要财政和技术支助。我们必须增强全社会的权能，特别是妇女、年轻人、失业者以及社会最弱势和最脆弱群体的权能。若要适当收获人口红利，就必须让年轻人参与社会、政治、劳工市场和工商业发展；

(f) 朝可持续发展方向作出的任何认真转变都需要性别平等。人类一半人口的集体智慧和能力是我们必须培养和开发的一种资源，以此造福子孙后代。赋予妇女全面经济权能很可能会促成下一波全球增长；

(g) 许多人认为，无法计量的东西是无法管理的。国际社会应当除计量国内生产总值之外也对发展进行计量，并编制新的可持续发展指数或一整套指标；

(h) 可持续发展筹资需要来自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大量新资本。这需要通过建立奖励机制，既调动更多的公共资金，同时也利用全球和国内资本来发挥全球私人资本的杠杆作用；

(i) 各级政府必须改变“筒仓”心态，进行综合思维和决策。他们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其议程和预算的最重要位置，探索国际合作的创新模式。各城市和当地社区在实地推进真正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大有可为；

(j) 各国际机构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必须通过大力借助现有机构并考虑设立全球可持续发展理事会以及采纳可持续发展目标，加强国际治理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k) 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应增加对适应和减少灾害风险的资源分配，并且把复原能力规划纳入其发展预算和发展战略中；

(l) 政府、市场和民众需要把眼光放远，不要局限于短期过渡计划和短期政治循环。目前在决策中注重短期利益的奖励做法应当改变。可持续的选择所引起的前期费用往往高于一切照旧。对于贫穷消费者和低收入国家而言，这些选择应当更易于获得、更负担得起而且更具吸引力。

18. 高级别小组认为，我们共同人类拥有为未来作选择的智慧和意志。因此，高级别小组站在希望的一边。在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成就都首先始于一个愿景，而后变为现实。实现全球可持续性，从而让人类和地球都具有复原能力这一愿景也同样如此。

19. 一个出生于2012年——也就是本报告发表之年——的儿童到2030年将年满18岁。在其间的岁月里，我们会作出足够的努力，让这个孩子拥有所有儿童都理应拥有的可持续、公平、具有复原能力的未来吗？本份报告试图给这个儿童一个回答。

二. 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进展

A.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

20.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其中为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著名的定义：“我们共同的未来”，认为这种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影响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不是终点，而是一个适应、学习和行动的动态过程。

21. 重要的是，可持续发展不是“环保”的代名词。相反，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就是对万事万物，尤其是对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各种相互联系的认识、理解和行动。可持续发展事关全局——如食物、水、土地和能源之间的重要联系。可持续发展是为了确保我们今天的行动与我们希望的未来前进方向保持一致。

22. 有鉴于此，当今世界距离实现可持续发展究竟有多远？自从布伦特兰报告发表以来，或者自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以来，或者自2002年约翰内斯堡首脑会议重申《里约原则》以来，到底有了多少真正改变？如方框1所示，真实的进展确已取得——但这个世界仍未踏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方框 1

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成效

以下关于所取得进展——或某些情况下缺乏进展——的简介概述了一系列关键领域的情况，在每个领域均审视了1990年至2010年（或已掌握数据的最近年份）所发生的变化。我们的目标是要说明前进的方向，而不是要说某个特定问题无望解决或已经“解决”。进展在哪里，哪些进展需要加强，我们在哪些方面偏离了轨道？

消除贫穷

世界人口中有27%生活在赤贫中，这个数字比1990年的46%有所降低

2000年，世界各国领导人作出承诺，到2015年将生活在极端贫穷状态的人数减少到1990年的一半。如今，世界有望实现这一目标。1990年，世界人口有46%生活在绝对贫穷中。在2005年，这个数字降到27%，预计到2015年可降至15%，这使世界更容易实现将全球贫穷人口减少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1990年至2005年间，中国和印度两国生活极端贫穷人数共减少了约4.55亿，预计到2015年，还将有3.20亿人脱贫。

在撒南非洲，脱贫进展似乎正在加快，目前预计到2015年，贫穷人口将下降至36%，虽然已接近29%的千年发展目标，但还是大大高于这个指标。

经济增长和不平等

自 1992 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了 75%，但不平等现象仍很严重

从 1992 到 2010 年，全球整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75%，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增长 40%。按人均计算，2000 年代，中等收入国家增长最快，其次是低收入，再其次是高收入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强劲经济增长已使许多穷人的生活显著改善。

但是，就绝对数字而言，富国和穷国之间人均收入差距不断加大。2010 年，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比中等收入国家高出 5 倍左右，比低收入国家高出 30 倍左右。1990 至 2005 年期间，国家一级平均收入不平等现象增加了约 20%，尽管“全球中产阶级”规模激增。过去 20 年来，许多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人口中 10%最富有者的平均收入是 10%最贫穷者的 9 倍左右。

饥饿和营养不良

自 2000 年以来，营养不良者增加了 2 000 万

世界人口即使已增至 70 亿，全球粮食产量仍一直跟得上需求步伐：今天的粮食产量足以轻而易举地养活我们所有人。但能否得到食物则是另一回事：近年来饥饿现象日增，粮食价格上涨。依赖进口的小国，特别是非洲小国，已受到粮食和经济危机的深刻影响。2000 年到 2008 年期间，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人口数目增加了约 2 000 万。近年来，农业“绿色革命”生产率的提高已开始呈现虎头蛇尾，人们对肥料等生产资料价格、水供应以及争夺土地现象感到关切，凡此种种均给供应前景投下阴影——而根据预计，到 2050 年，粮食需求将上升 70%。

森林

每年净消失 520 万公顷森林

2000 到 2010 年期间，每年约有 1 300 万公顷的森林被改作他用或消失，1990 年代则每年有 1 600 万公顷森林属于这种情况（2010 年全球森林总面积为 40 亿公顷）。尽管现在毁林速度有降低迹象，但世界森林覆盖率消失的速度依然惊人。地球陆地表面已失去 53%的原始植被，但这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而 1990 年代曾经是森林净损失率最高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已大幅度降低了植被损失率。

臭氧层

臭氧层将在 50 多年之后恢复到 1980 年前的水平

在南极上空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臭氧“空洞”之后，地球的保护层“平流层臭氧”的耗竭成了 1980 年代后期人们高度关切的一个环境问题。随着《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于 1989 年生效，氟氯化碳生产于 1996 年

完全淘汰，其后臭氧层的消耗明显放缓。如果没有订立《蒙特利尔议定书》，到 2065 年，地球将失去其臭氧层的三分之二，导致皮肤癌患急剧增加。相反，由于多边行动，臭氧层正在稳定恢复，南极上空的臭氧有可能在 2060 和 2075 年之间的某个时候恢复到 1980 年前的水平。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大自然向人类提供的服务有三分之二在逐渐减少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在 2002 年商定了具体目标，即“到 2010 年大幅度降低当前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但这个目标并未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第三版指出，虽然在降低一些地区热带雨林和红树林丧失速度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大多数生境状况正在恶化，物种灭绝似乎在加速。栽培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在减少，可能使作物更容易受灾。

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的丧失，是阻碍实现减少贫困、饥饿和疾病等千年发展目标的一个重大因素。在全世界范围，大自然为人类提供的服务有近三分之二正在减少。实际上，我们通过开发地球获得的收益一直是以消耗自然资本来实现的。较为积极的一面是，现已建立更多保护区(包括在陆地和沿海水域)，对特定物种的养护导致减少了损失，采取主动举措以解决生态系统遭破坏的一些直接原因，这些都有助于保持生态系统提供的重要服务。

海洋

85%的各类鱼类种群被过度开发，业已枯竭，正在恢复或已被全部开发

世界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沿海地区，因而无论是通过直接经济活动，还是由于其所提供的环境服务，海洋对于人类未来都至关重要。然而，过度捕捞已导致 85%的各类鱼类种群被归类为被过度开发、业已枯竭、正在恢复或已被全部开发。目前情况比 20 年前更糟。与此同时，农业废料的流入意味着自前工业化时代以来，海洋中氮和磷的含量已翻了三番，使沿海“死亡区”大量增多。此外，世界各大洋由于吸收了排放到大气中 26%的二氧化碳，正日益酸化，既影响海洋食物链，也影响到珊瑚礁的复原力。据信，如果海洋酸化继续下去，食物链就有可能中断，对众多物种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从而威胁到粮食安全，影响到全球数十亿人的海产饮食。

气候变化

1990 年到 2009 年期间，全球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 38%

尽管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1990 年到 2009 年期间，全球每年燃料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增加了约 38%，2000 年后的增速比 1990 年代要快。即使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采取了积极行动，世界仍将面临挑战，必须使自前工业化时代以来的全球气温上升幅度限制在摄氏 2 度。

实际上, 还不能说, 世界正在对气候变化积极采取行动。2011 年, 全球二氧化碳含量达到了百万分之 389, 如果政策没有重大转变, 二氧化碳含量有可能在未来数十年超过百万分之 450。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2010 年《排放差距报告》中得出结论说, 目前预测的 2020 年排放量将重蹈 21 世纪终了时的覆辙, 使气温上升 2.5 到 5 摄氏度, 使数以百万计人的生命受到因热浪及气候灾害所导致越来越多营养不良、疾病或伤患的威胁, 并可能使一些传染病病媒的地理范围发生变化。

能源

全世界有 20%的人无电可用

全球有超过 1.3 亿人(占世界人口 20%)无法获得可靠的电力, 与此同时仍有 2.7 亿人依靠传统生物燃料来满足炊事需要。不过, 据国际能源局估计, 为确保到 2030 年普及现代能源服务, 这也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一个先决条件, 只需较低成本(2030 年之前所需总体能源投资的 3%以下)就可实现普及, 而且对能源需求总量和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影响也不大。

近几年, 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供热和运输中所占的份额增长强劲有力, 据估计, 可再生能源占全球能源最终消费问题的 16%。2010 年, 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占新增发电能力总量的约 50%左右。2010 年, 电力部门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世界电力的近 20%。在一些国家的进展尤其迅速: 例如, 在中国, 可再生能源占总装机发电容量的约 26%, 而在巴西, 采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在 80%以上。

水和卫生设施

有 8.84 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用水

有 2.6 亿人没有基本的卫生设施

世界正在逐步实现、甚至超越千年发展目标中关于饮用水的指标。到 2015 年, 近 90%的发展中地区人口将获得改善了的饮用水水源, 而 1990 年则为 77%。即便如此, 截至 2008 年年底, 仍有 8.84 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用水, 全世界只有 57%的人可从连接管道获得饮用水。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卫生设施指标远未达到。2008 年, 全球范围改进型卫生设施覆盖率为 60%以上, 1990 年则为 54%, 仍有 26 亿人没有卫生设施。在没有改进型卫生设施的人群中, 有十分之七生活在农村地区, 而在城市地区, 为跟上人口增长, 还需为 7 亿人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性别平等问题

发展中国家 43%的农业劳动力是妇女

在全球范围, 中学入学方面的性别平等情况有所改善, 1991 年的男女生比例是 100: 76, 2008 年提高至 100: 95。根据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 20

年来，妇女在权利、教育、保健和劳动机会方面都有了大幅改善。中低收入国家的进展一直比发达国家快。但在各种社会和各个部门，男女之间仍持续存在差异。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平均占农业劳动力的 43%，但却比男子更有可能从事低工资、非全时和季节性的工作。女性农民在获得生产资料方面也一直遭受不平等待遇；这些问题如获解决，可促成增产，而且还可使营养不良的人减少 1 亿到 1.5 亿。

教育

有 6 700 万小学适龄儿童失学

自从推出“全民教育”倡议，并于 2000 年通过“千年发展目标”以来，全球范围教育领域已取得显著进展。其中大部分进展发生在世界上一些最贫穷国家。从 1999 年到 2008 年，又有 5 200 万儿童在小学就读。但 2009 年在全球范围，由于贫穷，仍有 6 700 万小学适龄儿童无法上学。在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国家，入学率的增长正在放缓，性别上的不平等仍妨碍女孩入学，特别是妨碍她们接受中学教育。2009 年，中学适龄儿童中约有 68% 入学，比 1999 年增加了 9%。全世界的成年人中约有 16%——即 7.93 亿人——仍缺乏基本的识字能力，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全球识字率有所改善，但进展缓慢。

健康

从 1990 到 2010 年，人类预期寿命延长了 3.5 岁

从 1990 到 2010 年，全世界范围的人类预期寿命延长了 3.5 岁。最不发达国家人口寿命延长了 6 岁，但其公民仍比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少活 11 年。自 1990 年以来，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了三分之一，但令人不安的是，撒南非洲和南亚的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仍然很高。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以解决肺炎、腹泻、疟疾和营养不良问题，那么就无法实现到 2015 年把婴儿死亡率减少三分之二的千年发展目标。尽管全世界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人数持续增长，但 2009 年新感染艾滋病毒者估计数比 1999 年低 19%。虽然每年全球结核病新病例数目在 2009 年继续增加，但肺结核死亡率已下降三分之一以上，而 2010 年因疟疾死亡的人数比 2000 年少 26%。然而，全球范围的非传染性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某些类型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病例——却稳步增多，在 2008 年造成约 3 600 万人死亡。除其他因素外，预计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也有重大的负面影响。

资料来源：数据取自各种消息来源，包括联合国、联合国环境计划署、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气象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3. 总体而言，迄今为止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进展既不够迅速，也并非深远。采取意义更深远的行动的紧迫性与日俱增。但正如下一节所述，在更广泛的全球范围，各方已在着手开展重大改革，这些改革将对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B. 变革的驱动因素

24. 当前现状正日益受到强大变革驱动力的挑战。在未来十年及以后，以下发展趋势及其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对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无论此一影响是好是坏。

1. 目前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资源稀缺所产生的影响

25. 首先，最重要的是，对于所有国家和各国人民而言，发展尚未达到可持续的程度，这一事实本身将会推动变革。因为根据定义，任何不可持续的趋势都不可能长久。实际上，地球大自然系统科技与知识日新月异，这清楚表明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对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和资源稀缺的影响。

26. 气候变化对所有国家和所有人都是风险。其预期影响包括：作物产量减少，尤其是在低纬度地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地处这类地区）；降水模式出现改变，诸如干旱热带等一些地区水供应出现减少；土地退化和荒漠化出现加剧；人类健康受到负面影响；海平面上升，对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拥有大面积沿海地区的国家社区构成生存威胁；极端天气带来新的风险。这些风险对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威胁尤为严重。

27. 人类无法无休止地适应日益加深的损害：迟早必须面对并且控制住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内在根源。只有通过让人类直接面对当前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代价，才能迫使我们生产和消费方式进行重大改变，而这并不意味着降低生活水平。我们进行这些变革的时候，也将有着重大机遇，在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全球惠益的部门出现新的就业机会。反之，行动迟缓会使问题恶化，增加成本并减少收益。气候变化要求世界必须踏上持续的经济、社会和体制创新及重建进程，解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挑战，并且直面涉及分担责任和风险的公平性的根本问题。

28. 同样，各国政府都已充分意识到资源稀缺的问题，尤其是能源、粮食、土地、森林和水的稀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如果资源价格暂时下跌，对资源稀缺的关切可能会减弱，但本质上的重大问题——例如对所有各类资源需求日增、不可持续地大量使用有限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以及对可持续资源使用体制投资不足（尽管正在增多）——会使资源稀缺以及对资源可持续性的关切很快会再度成为政策议程的优先事项。

29. 资源稀缺可能导致人们更广泛承认有必要积极努力节约资源，促进最有效地使用资源，尽可能以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并促进采取决定性政策行动，集体而一致地解决问题。但另一方面，资源稀缺也可能导致产生狭隘思维以及会

使事情变得更糟的举动，如粮食出口禁令、争夺石油和土地、因大国力求保障自身供应而引发更多地缘政治摩擦，或者实行有害和没有效果的补贴。

30. 环境退化现象包括肥沃土壤的流失、荒漠化、不可持续的森林管理、可用淡水的减少以及极其快速的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些现象没有给环境留下足够的时间以恢复或再生。生产和消费速度越快，加之废物管理不当，对生态系统的压力就越大，自然资源的耗费也越快，进而导致重要资源稀缺。在全世界范围，大自然为人类提供的服务中有近三分之二正处于减少状态。

31. 更广义而言，由于关键的大自然系统遭受严重压力，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试图查明和量化人类和大自然系统本身所涉及的风险。布伦特兰报告中承认，“有些门槛是不可逾越的，否则将会危害大自然系统的基本完整性”。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临界点”有可能被跨越，导致环境变化加速，也许会自我延续，而且可能很难甚至不可能逆转。斯德哥尔摩复原力中心就地球承载极限所从事的工作（见方框 2）是这一领域工作的一个重要实例。

方框 2

人类安全运作空间

2009 年，由来自斯德哥尔摩复原力中心的 Johan Rockström 领导的一群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地球承载极限”框架，目的是界定“人类安全操作空间”。该框架以科学研究为依据，而科学研究结果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已逐渐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这些科学家们断言，一旦人类活动跨越某些已被定义为“地球承载极限”的门槛或临界点，就有发生“不可逆转和突发环境变化”的风险。

现已确定共计 9 个极限：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生物地球化学流动（氮和磷）、平流层臭氧耗损、海洋酸化、全球淡水使用量、土地用途变化、大气气雾剂浓度和化学污染。

这些科学家估计，人类活动似乎已跨越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和全球氮循环变化相关联的界限。

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人类可能很快会接近干扰全球磷循环、全球淡水使用量、海洋酸化和全球土地用途变化的界限。

科学家们建议，这些界限彼此紧密相连，如果一个界限被跨越，其他界限就有可能变动，甚至造成其他界限被超越。

尽管科学家们强调，其评估意见只是初步评估，但他们所做的工作标志着一个重要转变，力求更系统地监测人类对其环境造成的影响。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复原力中心。更多信息见 www.stockholmresilience.org。

32. 随着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了解和认知逐步加深，为保护这些系统而开展全球行动的范围也会随之扩大，条件是：正确的监控、决策和执行制度必须到位，而且各方也有所需的政治意愿。

2. 创新

33. 从历史上看，创新产品、工序和政策使千百万大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如疫苗、经改良的谷物品种和移动电话等等)。全球化创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公司战略决策者有更多的机会挑选全世界的最佳做法和资源，并以新的、以前未曾预见的方式加以综合利用。在未来十年中，“技术创新”将出现“井喷”，特别是在生物技术与基因、计算机技术以及能源与资源利用和效率这些领域。其中，多数新技术将通过提高资源生产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帮助提供用水、能源和粮食等基本服务，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智能电网和节能技术以及可再生能源系统就是其中几个很好的例子。

34.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技术和其他创新的总体影响问题将根据以下方面来探讨：其对人类生态足迹的影响；贫穷国家和弱势群体对新技术的受益程度；对新技术给民众和环境可能带来的风险的管理成效。

方框 3

调动利用技术和创新：马斯达尔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斯达尔公司是一个集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整个价值链于一体的综合企业。

马斯达尔公司通过下属部门投资于清洁技术(如碳捕捉)，从事大型可持续能源项目，并为马斯达尔市清洁技术部门的展示、合作与伙伴协作提供全球平台。

马斯达尔公司设有两个总额为 5.40 亿美元的清洁技术基金。在西班牙，马斯达尔开发了最大型的商业聚光太阳能项目，利用熔盐能源储存技术，每天 24 小时为电网输送电力。其他项目包括伦敦的 1 000 兆瓦离岸阵列风电项目以及阿布扎比的 100 兆瓦光聚光太阳能项目。

通过上述项目，马斯达尔公司在本国和国际范围促进了可持续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缓解了全球变暖的影响，改善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安全。

资料来源：姆巴达拉开发公司。详细资料见 www.masdar.ae。

3. 人口变化

35. 目前，世界人口总数已经超过 70 亿。虽然今后 15 年左右还将有 10 亿人出生，但是自 1960 年代生育高峰以来，世界人口增长率已明显放缓。最新数据显示，到 2040 年全球人口可能增加至近 90 亿，在 2100 年超过 100 亿。在许多低

收入国家，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其中一些是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不少还是自然资源贫乏国家。联合国最新人口预测显示，目前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将从 2010 年的 8.32 亿增至 2030 年的 12.6 亿，在短短 20 年内增加 51%。¹

36. 同时，在目前青年人很集中的发展中国家，今后数十年将收获巨大的人口红利。随着受抚养比例下降以及青年(以及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提供大量的经济机会，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繁荣程度将大幅提高。

37. 但是，如果不提供教育和培训，如果不通过运作良好的市场和有效的政府政策来创造就业，这些国家就可能失去利用青年人口的机会。这些国家还将出现经济滞涨和社会动荡加剧的风险，因为低技能青年会对就业不足和所抱希望无法实现感到沮丧。

4. 全球经济的变化

38. 由于全球经济相互联系，对于全球大经济中发生的事件，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同时，国际经济管理决策过程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现在已出现新的行为体和新的动态(如 20 国集团和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基金组织的配额改革)。许多方面正再度就市场与监管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平衡问题展开激烈辩论。

39. 全球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不但没有在 2008 年后结束，反而扩及更多方面。每种危机都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并使可持续发展脱离正轨。这些危机目前包括：

(a) 主权债务危机，其主要根源在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各经济体，但由于外汇的持有而对每个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b) 金融危机，其表现形式为：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坏账大量积累而无法解决；

(c) 增长危机，其表现形式为：许多国家增长乏力，各方日益担忧可能会出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所描述的全球经济螺旋式下滑危险；

(d) 就业危机，其特点是全球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约 15 亿人处于几乎没有工作保障和就业权利的“脆弱就业”；

(e) 治理危机，其特点是各国政府苦苦商讨采取集体行动来管理经济风险或寻找改进银行部门监管的途径。

5. 绿色增长

40. 由大韩民国等国率先开拓的绿色增长力求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同时确保各种自然资产和环境服务得到保护和维持。绿色增长高度重视技术和创新，如智能

¹ 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 年订正本，第 1 卷：综合表格》(ST/ESA/SER.A/313)，2011 年，表 A.1。

电网、高能照明系统以及太阳能和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并且注重进一步刺激技术发展和创新。

41. 通过强调技术和创新、各种形式的合作以及社会环境和机构框架以促成低碳、可持续的社会，绿色增长为各国和国际社会实现愿景提供了多种选择。绿色增长能够塑造各种战略，以通过各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改进和广泛采用以及通过有效利用能源来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同时，绿色增长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并通过促进绿色企业及其所伴随的协同增效作用以及创造绿色就业机会，使经济体能够更好地应对人口的快速变化。绿色增长也能够通过改进和加强自然资源与资源的管理，帮助社会解决资源匮乏问题以及改善环境和自然资源，包括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42. 绿色增长战略也能够产生一种复原力更强、更能抵御气候、能源、粮食、资源及人口状况突变等外部冲击的增长模式。绿色增长还有助于促进扩大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而绿色增长的顺利实现离不开这种参与及合作。如果能够充分照顾到每个国家、地区或区域的需要和所处情况，并且辅以社会保护以确保增强包容性和稳定性，那么绿色增长就能够促成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6. 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43. 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表现在诸多方面：

(a) 十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固然实现了持续大幅增长，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 GDP 差异却有所扩大。努力克服这一差异将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b) 十年来，最高和最低五分位数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更为明显，在全球和多数国家内部都是如此(巴西和土耳其两国是重要的例外)；

(c) 虽然性别平等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进展，但是妇女在全面参与经济，包括就业、进入市场、获得信贷和拥有财产方面，仍然面临广泛多种障碍。消除这些障碍有助于释放妇女潜能，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d) 虽然社会平等有所改善，但是在世界多数国家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包括土著人、残疾人、无证移民以及因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而遭受歧视的人)仍常常遭受耻辱，在权利、机会和收入方面常常遭受不平等对待；

(e)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从目前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系统退化的速度来看，与平等和相互依存有关的重大问题也将日益出现——在全球气候政策等方面已是如此。

44. 虽然平等原则依然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则，但是在如何适用这项原则方面却存在争论，这意味着它没有成为相互依存世界可持续机构设计中的一个核心原则，反而常常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绊脚石。

45. 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各级当局面临着来自公民的新挑战，他们质疑当局的行动是否符合长期公共利益。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大大加强对短期结果和长期后果的问责制，这不仅是为了当今一代，也是为了将要从我们手中继承世界的今后数代。

46. 全球贫穷是一个仍有待克服的重大挑战。超过 10 亿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消除贫穷对于建设一个更加平等和可持续的世界有着根本的意义。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应该加大努力，消除贫穷，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特别是目标 1，消除饥饿和赤贫。

7. 不断变化的政治态势

47. 各国政府在确定发展路径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继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且拥有多种强大的手段。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发展模式，其中不少模式正在可再生能源、社会保护和粮食安全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但必须结合普遍存在的严重不平等和为快速发展付出无数环境和社会代价来加以看待)。部分国家已经成为援助提供国。他们从债务国发展成为盈余国，具有巨大的调动和调配资本的能力。

48. 建立更加多极世界的趋势可为国家之间一种新型、更有成果的合作奠定基础，这种合作将摆脱目前许多峰会期间出现的俗套。如果要推进可持续发展，我们的世界就不应像现在这样被分为相互排斥的北南两极，而是需要一种新的、更具前瞻性并且建立在相互依存和互利互惠基础上的格局。

49. 非政府行为体在国际关系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私营部门，崇尚革新的公司正在放弃“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志愿主义做法，而逐步采取更加明确、真正系统性的做法——在其自身活动中如此(比如实施标准或参加自愿性排放贸易市场，从而把可持续性纳入供应链的主流)，在其公共政策游说中也是如此(例如公司联合要求提高排放指标以及强化环境监管和价格制定方面长期稳定性)。

50. 许多国际和国家民间社会组织和运动正在打破单一问题框架，进而探寻更为广泛的议程。这些组织在影响和实行国家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并具有扩大可持续发展政治空间的潜力。

51. 最后，社交网络技术的爆炸式增长正在继续增强个人的能力，而其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很难预测。如果负责任地加以使用，如果“建言献策”平台能够促成对治理和决策采取更加合作、参与和透明的做法，那么这些技术可以导致产生积极的政治结果。

8. 城市化

52. 今天，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城市之中。20 年来，城市人口大幅增长，占全球人口比例超过 60%。在今后 20 年内，预计城市地区将再增 14 亿人口，从 2010 年的 35 亿增至 2030 年的 49 亿，并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中等城市(50 万至 100 万人口城市)。

53. 从全球来看，为了寻找工作和原居地缺乏的机会，人们正在向城市迁徙。全世界的城市地区已经成为研究和创新的集中地区。但是，全球向城市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城市使人们形成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对资源和生态系统的需求不断加大。增长区的这种有形扩展以牺牲可耕地和生态脆弱区为代价，导致城市无序扩张，并造成贫民区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缺乏基本便利的非正规住区（“贫民窟”）已成为外来人员的固定状态和生活方式，有害健康并形成安全隐患，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和其他环境风险。

54. 本报告重点谈及正义、可持续性和复原力这三个需求最为迫切的领域，并就如何启动朝可持续发展方向的过渡提出具体建议：(a) 增强人民作出可持续选择的能力(第三节)；(b) 努力实现可持续经济(第四节)；(c) 加强机构治理以支撑可持续发展(第五节)。



三. 增强人民作出可持续选择的能力

55. 我们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越大，对地球的潜在影响也就越大，因此采取可持续行动的责任也就更大——当今社会的情况尤其如此，全球化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意味着个人的选择有可能会造成全球性后果。但是，对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而言，问题不仅在于所作的选择不可持续，而首先是缺乏选择。要想有实实在在的选择，就必须保障人权、基本需求、人的安全和人类复原力。今天，我们履行消除贫穷的全球承诺对于可持续发展具有核心意义，对于确保平衡兼顾生物圈的需求和我们后代的需求也同样具有核心意义。

56. 本节就以下关键领域提出建议：

(a) 满足发展方面的基本要件：关于消除贫穷、促进人权和人的安全以及增进性别平等的国际承诺(第 57 至 66 段)；

(b) 通过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包括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并且开发技能，以帮助确保全社会都能为克服当今各种挑战和利用各种机会而作出贡献(第 67 至 77 段)；

(c) 创造就业机会，特别是为妇女和青年创造就业机会，以此促进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第 78 至 88 段)；

(d) 增强消费者作出可持续选择的能力，促进个人和集体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第 89 至 99 段)；

(e) 实行资源管理，推动 21 世纪绿色革命：农业、海洋与沿海系统、能源和技术(第 100 至 128 段)；

(f) 通过建立健全的安全网络以及减少灾难风险和进行适应规划来建设复原能力(第 89 至 138 段)。

A. 满足基本要件

57. 增强人民作出可持续选择的能力的一个关键前提是保证人民的人权，包括其直接或通过自由推选的代表参与政府管理的权利，以及确保思想、良知、宗教、意见、表达、结社和集会的根本自由。要作出可持续选择，就必须有机会影响我们的处境，主张我们的权利，表达我们的关切。人权早在 1948 年就得到了世界公认，公民有效参与的重要性在布伦特兰报告中得到强调，并在 1992 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得到认可。

58. 贫困人口是最易受政治不公、社会不平等及经济衰退影响的群体之一。他们也是最容易遭受气候变化、资源匮乏和环境退化影响的群体之一。他们在遭受污染、不良卫生条件和不洁用水所造成的健康风险方面首当其冲。他们依赖自然资源的程度最高，他们从自然资源中获取三分之二的收入，并把四分之三的收入用于满足食品和其他基本需求。消除贫穷对人民和地球的福祉至关重要，而为了消除贫穷，各国政府必须履行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现有各项承诺。

59. 要朝着可持续发展方面实现真正过渡，就必须克服特别是长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后世代的集体智慧和能力就有被浪费的危险。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中妇女状况得到了实际改善，但她们仍然面临多重障碍，无法充分发挥其作为公民、生产者和领导者的能力。

60. 在世界各地，担任决策职位的妇女比例普遍不足。妇女占国家议会席位的比例不到 20%，占部级职位的比例仅为 16%。即便在妇女担任决策职位的情况中，她们在各个部门的任职比例也参差不齐：虽然担任社会事务和福利部长的比例有 35%，但财政和贸易部长的比例则只有 19%，环境、自然资源和能源部长的比例仅 7%，科学和技术部部长的比例仅 3%。但是，证据显示，在妇女所占比例较高的情况下，集体需求均受到较大程度的重视——包括提供清洁水和教育以及专门建立保护区。多方面的证据显示，确保妇女参与冲突预防与和平进程会使和平解决更为长久。

61. 继承权和所有权方面的歧视性法律和做法是对妇女经济自主和经济潜力的严重制约。在农业部门尤为重要，因为在农业部门，推广服务常常由于女性农民

没有正式的土地所有权证明而不能获得成功。据估计，如果妇女像男子一样能够获得生产资料，那么女性农民的农作生产力就能提高 20%至 30%，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总体农业产出提高 2.5%至 4%，并使全球营养不良人口减少 12%至 17%。继承权和所有权在城市地区和非正规住区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能够在土地改革和社区恢复方案中确保在社会和经济上赋予妇女权能。

62. 改善计划生育服务、增进生殖权利以及改进医疗服务，对于可持续发展也同样具有根本的意义。这不仅能促成迅速提供医疗福利，降低母婴死亡率，而且还能减缓人口增长速度，有助于消除世代相传的贫穷，并减轻自然资源贫乏国家的负担。提供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与全面实现性别平等密切相关：在提供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情况下，性别平等程度往往较高，反之亦然。

63. 促使男子和妇女在知识、态度和行为上有所变化，同样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基本条件。这对于减少性骚扰、暴力分割女行为及跨界贩卖妇女和女孩现象而言，也特别重要，因为此类行为不仅侵犯了妇女和女孩的权利，而且在卫生、政策以及法律和相关支出方面也给幸存者、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代价，同时也使生产能力遭受损失。

建议 1

64. 各国政府和国际捐助方应进一步努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消除贫穷并减少不平等现象，以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建议 2

65. 各国政府应当尊重、维护和保障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和 1966 年《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承认的各项人权，包括直接或通过自由推选的代表参与政府管理的权利。

建议 3

66. 各国政府应加快兑现改善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的承诺，包括通过废除歧视性法律、消除正式障碍、进行机构改革以及制定和实行创新措施，以消除那些构成阻碍因素的非正规做法和文化习俗。应当特别注重：

(a) 确保妇女全面、平等地参与和控制生产资料，为此应保障平等享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平等获得整个价值链上的信贷、金融和推广服务；

(b) 确保妇女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参加参与式、能顺应需要、平等和包容性的政治决策进程；

(c) 确保普及高质量而且负担得起的计划生育服务以及其他性权利和生殖权利及保健服务。

B. 教育和技能促进可持续发展

67. 对教育和技能进行投资是推进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个直接途经。人们普遍确认，教育和技能是促进个人赋权和数代人脱贫的一个极为有效的手段，给年轻人特别是妇女带来重大的发展惠益。

68. 普及初等教育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尽管取得了实际进展，我们仍未走上正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2，即确保所有男女儿童到 2015 年都能完成全部小学课程。相反，有 6 700 万名小学年龄的儿童仍然失学，仍未接受初等教育。女孩的差距特别大。截至 2008 年，女孩仍占失学人口的 53% 以上。基础教育对于排除妇女在未来就业和政治参与方面所遇障碍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妇女目前大约构成全世界 7.93 亿成年文盲的三分之二。

69. 关于普及初等教育的千年发展目标尚未实现，部分原因是资金不足，尽管还有其他障碍。借助国际手段来补充资金以及支持地方和国家努力，会有助于克服教员不足和基础设施缺乏等挑战。世界银行的全球教育伙伴关系计划为帮助各国发展并实施正确的教育战略提供了一个模式。

70. 虽然初等教育是发展的基础，但是初等后和中等教育及职业培训对于建设可持续未来也十分重要。在发展中国家，每增加一年教育，个人收入便会平均增加 10%。研究还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完成中学教育的妇女比仅完成小学教育的妇女平均少生一个孩子，使家庭经济财富更多，而且也减少跨代贫穷。此外，以旨在为 21 世纪经济培养关键技能的课程——如生态系统管理、科学、技术和工程——为基础的初等后教育可鼓励创新和加快技术转让，并提供对新的绿色工作很重要的技能。然而在今天，估计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儿童完成中等教育。

71. 同时，据预计，适当技能的缺乏将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技工的招聘将需要新的劳动力，可以借助年轻人和妇女的能力。他们目前在这些部门的任职人数长期很少。妇女仅为建筑劳动力的 9%，工程服务的 12%，金融和工商业服务的 15% 以及制造业的 24%。

72. 技术和职业培训是极其重要的，可促进增长和人的能力建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包括保健、教育和公共福利等部门的需求。这些部门缺乏熟练劳动力，有可能会阻碍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73. 所有部门的培训都必须是符合现实需要、负担得起、可以获取而且由有资格的合格从业人员提供。有必要同私营部门协调发展培训，以确保适合工业需要，而且所授予的证书为各公司所接受，承认构成足够的资格。此外还必须将职业技能培训视为其他传统教育途径的合适替代。

74. 近年来，职业和技能培训的提供方式的创新出现了激增，从创业“新兵训练营”、知识分享和技术交流中心以及妇女对妇女工商业培训，到辅导方案、青年学徒计划以及研究和交流方案。但还需要作出更加协调一致和更大规模的努力。

建议 4

75. 各国政府应考虑设立一个全球教育基金。这个基金应旨在吸引来自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支持，从目前的世界银行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发展而来，而且其任务是到 2015 年缩小小学教育差距，以便能够真正有希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2。

建议 5

76. 各国政府应加大实现到 2015 年普及初等教育的千年发展目标 2 的力度，并确定不迟于 2030 年普及高质量初等后和中等教育的目标，同时注重可持续增长和就业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建议 6

77. 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相关国际发展合作伙伴应共同努力，提供职业培训、再培训及职业发展，以配合终身学习，从而弥补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部门中的技术短缺。它们应在这些努力中优先考虑妇女、年轻人和弱势群体。

C. 创造就业机会

78. 在各经济体转向可持续未来的过程中，将会创造一些新工作，失去一些工作，许多工作将作调整。极其需要制定一套适当的举措，以加强个人和社区的能力，使其有能力管理这一过渡进程，实现更可持续的未来。由于经济衰退剥夺了许多工人的工作，阻碍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造成失业者及其家人所处状况恶化，这一点尤为重要。

79. 然而，随着经济变得更加绿色，参与维护或恢复环境的部门——从可持续能源及建筑环境中重新安装节能技术，到可持续废物管理和环境补救——有很大的创造体面就业空间。预计，到 2015 年，全球环境产品和服务部门的价值将高达 8 000 亿美元。

80. 绿色部门的工作也可以有其他好处。劳动不仅仅是为了经济收益和满足市场需求。它有着社会价值，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手段。为接受或崇尚可持续原则的公司工作的雇员对工作的满意度有所提高。要想提供更体面的工作，就显然需要经济增长。

81. 至关重要的是，必须营造一个有利的工商业环境，包括法治、产权、宏观经济稳定和开放竞争。各国政府有必要使之成为其决策和预算的优先重点。有了这些基本条件，有针对性的措施就更可能对整个社会以及劳动力市场中就业人数不足的群体——如妇女和青年——产生收效。

82. 预计未来几十年每月将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一个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可以吸收并利用这种人口红利。年轻人还具备未发掘的潜力；他们

受最近经济危机的影响最大，当今世界上有 8 100 万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另有 1.52 亿年轻人虽然有工作，但却生活在每日所得少于 1.25 美元的家庭里。他们的选择之一将是成立一个微型或小型企业。创业教育、获取资金、辅助性行政和监管框架以及工商业援助和支持方案，都是创业活动的关键要素。

83. 妇女赋权尤其能够发挥潜力，给家庭、社区和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好处。研究表明，如能消除男女就业率差距，就可以在美利坚合众国把国内生产总值提升 9%，在欧元区提升 13%，在日本提升 16%。其他研究表明，缩小工资上的性别差距也可产生很大经济效益。例如，在澳大利亚，工资上的性别差距缩小 1%，经济就会出现相当于国民总产值 0.5% 的增长。然而，工资差距依然存在。例如，在美国，2010 年，妇女担任财富 500 强企业首席执行官职务的人数不到 15%，最高收入职务中所占比例不到 8%，尽管在劳动力中却占 48%。

84. 妇女也面临很大的失业风险：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受当前经济危机的影响更大，因为其在出口导向型工厂工作和在服务行业作为移民工就业中的比重较大。这两个部门都在经济衰退期间表现不好。此外，妇女的非正式工作在国家劳动力统计数字中看不见，而且没有被纳入社会保护计划。

方框 4

平等意味着生意

妇女赋权原则——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和联合国全球契约的一个伙伴关系倡议——是为工商业提出的一套七项原则，提出了关于如何在工作场所、市场和社区增强妇女权能的准则。

包括大型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在内的 250 多名首席执行官已确认支持这些原则，其中涉及公司领导人促进性别平等；工作场所公平待遇和相互尊重；所有工人的健康、安全和福祉；所有妇女的教育、培训和专业发展；可为妇女赋权的工商业发展和做法；促进平等的社区倡议；实现性别平等方面所取得进展的衡量和报告。

一些公司还要求提供针对不同性别的报告准则，以帮助实践这些原则。作为回应，妇女赋权原则正在制定针对不同性别的报告准则，其中借鉴《全球报告倡议》标准和《全球契约进展情况通报》。

资料来源：《联合国全球契约》，www.unglobalcompact.org/Issues/human_rights/equality_means_business.html。

建议 7

85. 各国政府应实施并推进“绿色工作”和体面工作政策，作为其预算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一项优先工作，同时也为私营部门的新就业创造条件。

建议 8

86. 各国政府和工商业应建立伙伴关系，为年轻企业家创业提供启动服务。

建议 9

87. 雇主、政府和工会应对促进工作场所平等采取综合做法，包括实行不歧视原则；采取推动妇女担任领导角色的措施；针对工作与生活以及健康采取对性别有敏感认识的政策；促成面向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教育、培训和专业发展；承诺衡量并公开通报进展情况。

建议 10

88. 各国政府和工商业应认识到，确保妇女充分参与经济活动，可产生经济惠益，为此应制定经济政策，明确应对那些使妇女能力受限的独特挑战，特别是：

- (a) 允许女性农民获取土地和资源；
- (b) 改善妇女获得资本和金融服务的机会；
- (c) 改善通过贸易和技术援助方案及小额信贷进入市场的机会；
- (d) 支持妇女在公共和私营部门晋升为领导人。

D. 扶持性的可持续选择

89. 根据经合组织 2010 年的一份工作文件，全球中产阶级的规模可能会从目前的 18 亿人增至 2020 年的 32 亿人，到 2030 年更增至 49 亿人。全球中产阶级的定义是所有那些生活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日人均收入 10 美元至 100 美元的家庭人口。

90. 虽然这种转变在许多方面是发展方面的一个成功故事，但“全球中产阶级”日益增多，加上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形成了一种威胁，可能会把我们无情地推向自然资源和地球维生系统——从食物、水和能源到海洋、气候和氮循环等全球系统——的极限。如果不作重大改变，那么地球支撑和维持我们的能力将继续退化，最终可能随着关键阈值和临界点的突破以及社会谋公平压力的增强而发生突变。

91. 但是，现在有机会解决这种不可持续的状况，并提高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效率与公平性，以便即使在人口日益增长和全球繁荣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也可保持地球的健康。

92. 虽然政府政策和技术创新在帮助世界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但人们作出的选择也至关重要，并取决于广泛的考虑因素，如政治观点、习惯和道德价值。例如，提供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的公共交通工具和车辆只是成功了一半；个人也需要珍视并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从而使社会能够获得其全部惠益。同样，全球讨论是通过《地球宪章》等举措推动的，它能促进对于后代的意识和共同责任感、全球可持续性和跨文化对话。

93. 出于这一原因，必须向消费者提供现有可用的、负担得起和有吸引力的可持续选择。例如，如果期待最终用户使用一项新的技术或采取不同的、更可持续的行为方式，就必须在设计和城市规划方面与其进行协商。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产品标准是有助于影响人们所作选择的重要工具。

94. 同样重要的是，应当了解我们环境、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所作选择的后果。因此，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问题纳入教育课程。

方框 5

需要更可持续的饮食

我们生产和消费粮食的方式可能会对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健康

- 有 10 亿人目前得不到营养食品。
- 最近的估计表明，因营养素(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包括铁和碘)摄取不足而产生的合并后果在儿童死亡人数中占了 35%，在全球疾病总数中占了 11%。
- 另一方面，肥胖症和糖尿病发病率在全球上升。若干种与营养有关的慢性疾病，如冠心病和中风等，现在都属于全球主要死亡致因之列。世界上收入最低国家的负担增长最快，有时导致出现营养不足和营养过剩“双重负担”，给社会和保健系统造成巨大负担。

浪费

- 由于整个粮食供应链效率低下，每年全世界约有三分之一为人类消费而生产的粮食遭损耗或浪费(约 13 亿吨)。
- 高收入国家消费者浪费的粮食(2.22 亿吨)大体相当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全部粮食产量(2.3 亿吨)。工业化国家的粮食损耗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高。但是，在发展中国家，40%以上的粮食损耗发生在收获后和加工阶段，而在工业化国家，40%以上的粮食损耗发生在零售和消费阶段

生态足迹

- 在收入以及肉类和奶制品需求不断提高的影响下，饮食模式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粮食生产的用水密度。粮食生产所需水量的三分之二用于牲畜食品，四分之一用于放牧。这说明食物的生态足迹越来越大。
- 目前的农业做法在全球用水量中占 70%，其中三分之二用于生产牲畜食品。据估计，每年浪费的粮食在生产时所需要的灌溉用水量相当于 90 亿人生活所需用水量。

- 畜牧业生产也占农业用地的 70%、全球土地使用量的 30%、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18%。
- 据估计，过少捕捞或中度捕捞的海洋鱼类种群比例已从 1970 年代中期的 40% 下降到 2008 年的 15%，而过度捕捞、已耗竭或正在恢复的鱼类种群比例已从 1974 年的 10% 增至 2008 年的 32%。据估计，全球海洋鱼类种群的 53% 已达到捕捞极限，28% 已过度捕捞，3% 已经耗竭，1% 正在从耗竭中恢复。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瑞典食品与生物技术研究所。

95. 通过可靠标签来获取信息对于作出明智、可持续的选择至关重要。以技术上可行、经准确衡量的标准来确定标签——尤其是在对人类和地球健康影响巨大的领域——可以帮助消费者了解他们所作选择的全部代价，并促使市场奖励可持续生产者。因此，极其需要制定成本效益高的监测、核查和评估机制以及为制定这些机制而实行公开、透明、平衡和讲求科学的程序，以此确保准确性以及防止滥用生态标签作为一种贸易壁垒。

方框 6

公司向前迈进

公私伙伴协作在制定信息和报告标准方面取得成功的事例有很多。在温室气体排放领域，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开展联合努力，制订了《温室气体议定书》。这是由世界各地数百个私营公司用于监视、报告和管理气体排放的一个会计工具。

中美洲最大的一家公司——2010 年在哥斯达黎加收入超过 5.7 亿美元——自愿制订了三重底线标准，不仅以经济指标而且也以社会和环境指标衡量它的成功。鉴于节约用水是该国的一项优先重点，该公司作了投资并改变了做法，从前些年的每公升饮料用 12 公升水改进到了 2011 年的 4.9 公升，制定了到 2012 年实现平衡用水的目标。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中包含了奖励机制，其中约 60% 与三重底线绩效挂钩。这可能促成了一种三赢局面：该公司在 2006 年到 2010 年之间实现的增长是同行业平均水平的两倍。

碳排放披露项目是约 60 个国家的 3 000 多个组织目前测量和披露其温室气体排放量、水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战略的一个平台，可帮助它们设定减排目标，改进业绩，并向关心此问题的利益攸关方和消费者提供信息。

资料来源：《温室气体议定书》(www.ghgprotocol.org)；世界经济论坛，“重新定义未来的增长：新的可持续性领军者” (2011)；碳排放披露项目(www.cdproject.net)。

建议 11

96. 各国政府和其他公共当局应推动公开、透明、平衡和讲求科学的进程，促进制定能充分反映生产和消费影响的标签制度和其他机制，并与私营部门合作确保标签、公司报告和宣传内容准确、成本效益高且值得信赖，从而让消费者能够作出知情选择，特别是在对人类和自然系统影响重大的领域，同时不应制造贸易壁垒。

建议 12

97. 各国政府应向消费者提供更易于获得、负担得起和有吸引力的可持续选择，为此应与私营部门一道，按照现有最佳技术并在不制造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制定可持续产品标准，同时也运用价格奖惩办法。

建议 13

98. 各国政府和非政府实体应推广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消费概念。这些概念应纳入初等和中等教育课程。

建议 14

99. 小组欢迎所有利益攸关方以相关经验和包括《地球宪章》在内各项文书为基础，在 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里约+20）上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的道德层面，使各国政府在选择努力转向可持续发展时做到心中有数。

E. 管理资源和带动 21 世纪绿色革命**1. 农业**

100. 绿色革命虽然避免了大规模饥荒，但也导致资源承受更大压力，而且从那以后人们已意识到这种压力不可持续。农业变得严重依赖化石燃料投入，在这一过程中易受高油价的影响，并且常常恣意浪费水资源，目前已达到在全球淡水使用量中占 70% 的程度。现在有必要发起一场 21 世纪绿色革命，这不仅是一场提高生产率的革命，而且也是一场大大减少能耗并在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革命。

101. 新的农业革命应侧重于可持续强化（低外部投入、低排放和低废物的做法）以及作物多样化和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新的“绿色”生物技术可发挥有价值的作用，使农民能够适应气候变化、提高抗虫害能力、恢复土壤肥力以及促进农村经济多样化。

102. 如能立即推动可持续的农业，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红利。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穷人生活在农村地区，有 25 亿农村居民务农，其中有 15 亿为小土地拥有户。预计到 2050 年，全球粮食需求量将增加 70%，因而这些人的生活有着大幅改善的机会，与此同时，这也会帮助他们转向更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103. 小农户有巨大的潜力尚待挖掘，可促成提高产量，刺激农村经济以及成为出口创收者，而不是粮食净购买者。不过，为了实现这一点，养活近三分之一世

界人口的小农户需要获得资产(从土地到耕种所需工具)、市场(从农村道路到监测全球市场价格的 21 世纪通信工具)、贷款和风险管理(如作物保险和社会保护)以及研究成果和技术。

104. 成功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很大一部分投资仍将来自各国的国内资源,但其他资源则需要靠官方发展援助提供。农业援助总额尽管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减少了 43%,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南亚和中亚等需求最大的地区,近期出现了上升趋势且保持稳定。私营部门和公司伙伴关系也将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创新性筹资问题可能也很重要(见下文第四节)。

105. 虽然低收入国家的农业部门亟需投资,但土地使用契约的新趋势常常加重穷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和水资源方面面临的地方上长期存在的制约因素。据估计,自 2000 年以来,通过新的国际投资交易购置的土地(及地上地下流动的水)有 8 000 万公顷,其中一半以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不过,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各利益攸关方要想在此类安排中促进可持续决策,同时又不妨碍贸易,则须服从政策指导,如,2009 年《尊重权利、生计和资源的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

106. 成功与否还将取决于各机构和倡议是否有能力有效地协调农业、土地管理和供水这些优先领域的各种努力。在研究、政策指导和知识共享方面起引导作用的机构,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对于协调一致地解决问题而言日益重要。不过,综合资源管理将最终依赖善治和管理。这些因素或许对流域管理极为重要,因为在流域管理中需要采取综合办法,以反映彼此竞争的部门对此种资源的多部门迫切需求以及采取综合对策的必要性。

107. 要想进行可持续的农业革命,就需要继续努力减少国际农业贸易壁垒,特别是完成多哈发展回合。另外还需要注意许多因素,其中包括:大规模改进推广服务,因为大部分小农为妇女,故而这些服务必须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集中开展可持续创新,并大大增加农业研究和发展方面的投资。这项努力应尤其以撒哈拉南部非洲为重点,因为自 1960 年以来,那里的农业产量下降了 10%,气候变化有可能对农业造成尤为严重的影响。

建议 15

108.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应努力促成一场新的 21 世纪绿色革命,一场“长青革命”,其目标是把生产力至少提高一倍,同时大大减少资源使用量,并且避免生物多样性进一步丧失、表土流失以及水资源耗竭和污染,包括为此增加对农业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以确保实验室里的先进研究成果迅速应用到实地。各国政府应要求粮农组织与各主要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合作,启动和协调这项工作,因为该组织负有减轻世界粮食短缺问题的独特使命。

建议 16

109. 各国政府应努力就可持续和负责任水土投资交易全球原则达成协议，包括持续努力推动负责任的农业投资，其中尤其应强调在确保环境可持续性的同时，保护依赖这些基本资源的贫困民众的权利和生计。

建议 17

110. 各国政府应制订并加强水资源综合管理计划，同时充分铭记水资源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包括可供饮用以及用于卫生、农业、工业和能源业。

方框 7**莫桑比克的粮食-能源企业**

一些私营公司已经与莫桑比克地方当局建立了伙伴关系，致力建立新的粮食-能源综合企业，以清洁乙醇炉灶取代数以千计的烧木炭炉灶。

这一商业模式旨在使农民的收入增加许多倍，每年拯救大约 9 000 英亩原生林，并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该模式力求为首都马普托 20% 的本地住户提供清洁和有竞争力的木炭替代办法，以帮助保护生命，使其不受危险木炭烟的影响。

农民将有机会从刀耕火种式农业和木炭生产过渡到培育广泛各类作物和树木。据预测，转而生产更加多样的食品以及即将在城区市场出售用木薯制成的乙醇烹饪燃料，将会大大提高收入和营养水平，同时也使退化的土壤得以恢复并加强生物多样性。

数千个小农户将参与建立一个粮食和乙醇烹饪燃料生产设施，采用可持续的耕种做法，并为经济和生态上可持续的社区奠定基础。

资料来源：www.cleanstarmozambique.com。

2. 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

111. 数亿人依赖海洋地区获得食物、生计、休闲、文化和经济机会。世界渔业提供了 1.7 亿个就业机会，超过 15 亿人摄入的蛋白质来自海洋资源。渔业、海洋和沿海旅游业、运输业、水产养殖业以及其他使用沿海和海洋环境的行业为数百万人提供了生计。珊瑚礁、岛屿、红树林和其他湿地等主要生境提供着生态系统服务，如提供保护以抵御极端气候事件、形成渔业繁殖区以及构成淡水和海水交汇处。沿海和海洋是许多国家和人民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固有组成部分。

112. 世界各地的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正在退化，随之而来的是海洋所提供全面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减弱。珊瑚礁和红树林等主要生态系统可能已经到达或很快将到达关键临界点，对最脆弱的民众和社区造成严重影响。

113. 与海洋有关的现有可持续发展承诺，如《21 世纪议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所载承诺，恰当指出了需要开展的工作。但是，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却继续在退化，其原因是，由于诸如缺乏能力和信息以及人们误认为环境与发展关切之间存在互竞关系等问题，经济、产业、社区和生计结构在许多情况中是围绕不可持续的海洋资源使用做法建立的。此类做法频繁导致使用者所依赖的海洋生态系统退化。

114. 在海洋管理方面开展生态系统范围的区域长期统筹合作，将使所有使用者都有机会参与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这一合作也有助于集中资源和专门知识，并使各国和各经济部门的措施互不抵触。这方面已有现成的例子，例如太平洋景框架、珊瑚三角区倡议、加勒比海委员会、南亚区域合作沿海管理中心联盟、全东南亚沿海合作倡议和其他倡议。但这些并未得到全面落实，全球有很多区域也尚未制订此类办法。

建议 18

115. 各国政府应致力于在主要海洋生态系统建立区域海洋和沿海管理框架，包括：

- (a) 加强海洋和沿海管理合作，并让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
- (b) 各区域国家考虑到其本区域具体需要、生态系统和使用者，进行海洋和沿海规划，并辅以可靠的供资机制，以制订和实施这些规划；
- (c) 建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他沿海国海洋管理人员、决策者和科学人员的能力；
- (d) 加强监测和监视系统。

建议 19

116.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应当在其运作的区域力求使其政策和做法与区域海洋的协调管理相一致并为其提供支持。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各国政府和海洋管理人员应重视采取注重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办法，以提高经济和环境效益。

方框 8

大堡礁：可持续地管理自然资源

澳大利亚大堡礁是地球上最大的珊瑚礁生态系统，这里有着从近海浅水岸礁和海草床到大洋深水域的形形色色的植物、动物及生境。多种用途的大堡礁海洋公园沿着昆士兰海岸绵延 2 300 多公里，面积 344 400 平方公里。1981 年，该公园因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被列为世界遗产。

大堡礁对于 100 多万澳大利亚人的经济和社会福祉也同样至关重要。大堡礁及其相邻流域支撑着各种产业，每年创收 500 多亿澳元。前去大堡礁的游客

每年约有 200 万人；旅游业每年创收近 50 亿澳元，并提供了 50 000 多个工作机会。航运业极为重要；昆士兰的年度商品出口额为 170 亿澳元，其中大部分商品是经由大堡礁沿岸的 10 个主要港口运出的。大堡礁附近有 10 个商业渔场，每年可创造约 1.4 亿澳元的经济收入。

要想可持续地管理大堡礁，就必须通过维护该区域的自然和文化完整性来平衡人类对它的利用。大堡礁海洋公园的分区规划对主要地区提供了高度保护，同时允许在其他各区(包括许多类别的捕捞活动)进行各种其他方式的可持续利用。“保育区”(即禁渔区)占公园面积的 33%(115 000 平方公里)。邻州海洋公园以及在大堡礁很多岛屿上宣布建立的国家公园对联邦海洋公园和分区规划形成了补充，所有公园都作为单一方案的一部分加以管理。

现已制订其他管理办法，以维持水质；减少营养物和沉积物流失；保护流域内植被；保护高价值湿地和其他重要生态区；减少船只搁浅事故；让传统所有人参与海洋公园的管理和利用。这些措施可确保把大堡礁作为世界标志性海洋保护区之一，传给子孙后代。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政府。

3. 能源

117. 现代和可持续能源服务的缺乏不仅对气候变化造成严重影响，而且随着各家各户采用效率较低的不洁能源来源满足其需求，也对家庭经济 and 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据估计，目前有超过 13 亿人不能用上电，有 27 亿人使用传统生物质能燃料做饭，将近一半的世界人口仍依赖未经加工的生物质、煤或木炭等固体燃料。

118. 如果人们普遍可以获得能源，那么充满新机会的前景将展现在面前，包括有机会获得现代通信和信息手段、新生计和培训选择以及强大经济增长推力。要想将这些机会变为现实，就必须持续推进与仍“未通电网”的社区建立联系。

119. 不过，生产和利用能源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这些代价从气候变化到能源安全和环境退化不等。有多种备选办法可用于应对这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办法包括开发和广泛普及可再生能源以及提高能效。在政府新方案和大量新投资的支持下，这两种备选办法近期已得到广泛采用。例如，布隆伯格新能源筹资公司指出，2011 年清洁能源投资总额已达到创记录的 2 060 亿美元，是 7 年前所获投资总额的五倍。其中，太阳能投资总额增至 1 360 亿美元。同时，在过去十年里，世界各经济体的能耗继续降低。虽然取得了这些进展，但能源部门仍然在可持续发展的所有方面面临重大挑战。

方框 9

能源供应和减排方面的公私伙伴关系

北溪公司 1 224 公里长的水下管道途径波罗的海区域的五个经济区，它将把天然气从俄罗斯联邦直接输送到欧洲 2 600 万住户家里；在以天然气取代煤炭之后，这条管道还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11 年 11 月启动了第一段管道铺设工程。

北溪公司在实施管道项目时遵循了国际环境标准，它也遵守了环境、海事和法律方面的国家和国际规定，包括《越境环境影响评估公约》(1991 年，埃斯波)。北溪公司计划为其环境和社会监测方案投资大约 4 000 万欧元，并承诺与波罗的海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分享其现有调查数据。在实施监测方案期间收集的数据将为该委员会的波罗的海行动计划提供资料。此计划力求到 2021 年将波罗的海海洋环境恢复到良好的生态状况。

资料来源：北溪公司(www.nord-stream.com)。

120. 为了解决能源获取问题以及提高能效和更快速采用可再生能源，秘书长牵头发起了一项新倡议：“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该倡议确立了到 2030 年应实现的三项目标：普及现代能源服务；能效提高速度翻一倍；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所占份额翻一倍。

建议 20

121. 各国政府应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协作，确保到 2030 年普及能负担得起的可持续能源，并力求将能效提高速度和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所占份额翻一倍。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应通过奖励研究和开发活动以及投资于这些活动，推广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

4. 创新和技术

122. 创新和技术对于促进可持续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在偏远地区，蜂窝式通讯网络促成了“移动式货币”的使用，使小企业业主得以进入更大规模的市场，并为农民提供即时气象信息，使其能够节约用水并提高作物产量。移动电话还可用于发送预警，在飓风和洪水等极端气候事件中拯救生命。

123. 同样，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利用有助于改进保健服务，例如，此类技术允许提供远程医疗，使医生可远程诊治患者，从而帮助穷人节省前往诊所所需的旅行费用。与此同时，开放数据平台意外促使公共和私营部门提高了透明度，并促成在自然资源管理等方面进行更多的知识共享和作出更妥善决策。

方框 10

Red Eléctrica 公司智能网

电力无法大量存储,因此生产量必须总是与消费量准确、即时地保持同步,这要求不断进行平衡。作为唯一的输电代理公司、输电网管理公司和西班牙电力系统运营商,西班牙公司 Red Eléctrica 的作用包括确保发电站的计划产量在任何时候都与实际消费需求相符。如果二者之间出现差异,该公司就会向发电站发出增产或减产的适当指示。

Red Eléctrica 采用最新技术与发电站保持实时沟通,对电力需求进行实时跟踪,获取电力系统在安全条件下运营所需的数据,并管理发电站的可用性、对输电网的限制及国际交流(与法国、葡萄牙和摩洛哥)。该公司还对年度电力需求变化情况进行预测,以拟订下一年的输电网发展计划。调整服务可帮助使生产方案符合电力系统的质量、可靠性和安全规定。

今后,Red Eléctrica 有能力安全地并入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最多占总需求量的 60%)。在过去 5 年里,西班牙电网中已并入超过 30 万京瓦时的可再生能源,其中大部分为风能电力。供电保障和质量取决于是否持续投资于提高输电网的可靠性,包括增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作用。

资料来源:西班牙 Red Eléctrica 股份有限公司可在 <http://www.ree.es/ingles/home.asp> 查阅更多资料。

124. 目前超过 50 亿人(占世界人口的 80%)可以使用电信网络。不过,虽然近几十年来取得了快速进展,目前五分之四的移动电话用户是在发展中世界,但是仍然有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几乎全部在发展中国家)仍然没有机会用上因特网,中低收入国家的妇女拥有移动电话的可能性比男子低 21%。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农村地区根本没有电话信号。

125. “连通性革命”迄今一直靠私营部门推动,因此各国政府理所当然需要更多地参与这方面工作,以解决一些地区无人关心以及相关费用过高的问题,并开发本地内容和应用程序,以防新的通信技术变成造成不平等的新因素。有了妥当的政策,新的通信技术就能在多个领域带来好处,包括为得不到充分服务的民众提供教育和经济机会以及推广可持续的做法,并推动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在当今经济状况下,它们构成创造就业的驱动力量。

126. 国际合作能促成开发并更深入普及更多技术。目前各方已为此开展一些工作,尽管仍然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在墨西哥坎昆和南非德班,各国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范畴内设立了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以开发并促进推广无害环境的技术。国际农业研究协商集团是一个力求促使各组织参与可持续农业研究的全球伙伴协作机构,有 15 个中心与数百个伙伴组织协作开展研究活动。人力和财政资源的汇集有助于进一步应对全球目前的挑战。

建议 21

127. 各国政府应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到 2025 年使公民特别是偏远地区公民能有机会使用技术，包括普及电信和宽带网络。

建议 22

128. 应鼓励各国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大公司更广泛地参与注重创新和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国际合作，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并充分利用气候友好型技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发展绿色经济方面可发挥的潜在作用。在坎昆和德班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各项协议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可喜一步。

F. 建设复原力

1. 社会保护制度

129. 同任何重大过渡进程一样，全球转向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将带来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的结构性变化，这个过程既会产生契机，也会形成新的限制。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护和安全网是尽可能减少困难的基本工具，对于在风险加剧时期广泛建设复原力可起到关键作用，无论这种风险是气候变化、资源匮乏、金融不稳定所致，还是食品和其他基本货物价格上涨使然。

130. 社会保护制度如果运作得当，不仅可以像跳板一样激发努力，增强人们在这种挑战中恢复积极生活的权能，而且有助于建设行事有效的国家，因为这些制度能够加深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而这种契约正是治理问题的核心所在。同时，拟订社会保护制度还必须注意，这些制度不可忽视那些没有计入国家劳动力统计数字的社会阶层——有时是男子，但更常见的是妇女，这些群体从事不为人所见的非正规劳动，往往未被列入社会保护计划。

方框 11

《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

《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是一项以需求为驱动、以人为本的就业方案，它通过基于法定权利的参与式分散治理过程，为印度农村居民提供生计保障。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护网，迄今已使 3 400 万个家庭受益。

该方案的运作方式是依法保障每个农村家庭的每个成年人每年就业 100 天，并获得有联邦法律保障的规定最低工资。该方案的长处之一是由需求驱动，每个要求工作的公民都能在提交申请后 15 天内得到工作。该方案采取自下而上方式，其规划和实施均在地方一级进行，全部决策权都授予乡村议会一级。该方案迄今提供的就业已达 14.4 亿人/日。

在这一过程中，该方案通过由农村社区选择的工程，创造了可持续农村资产，并促进了生态复原。这些工程常常在环境方面产生周边效应：所选工程50%以上与水源保护有关(例如微型灌溉或修复水利工程)，15%以上与生态复原和地方一级林业活动有关。

资料来源：印度政府农村发展部。详见：www.nrega.nic.in。

131. 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社会保护必不可少的四个最基本要素。这四个要素是很多国家持续努力实现的目标，尽管已达到这些目标的国家很少：

(a) 所有居民均有机会获得国家规定的一套基本保健服务，包括孕产妇保健，并享有必要的经济保护，能够负担这些服务；

(b) 所有儿童均应在国家划定的贫穷线以上，必要时应通过旨在协助获得营养、教育和照顾的家庭/儿童福利使儿童达到贫穷线以上；

(c) 活跃年龄群体中所有无力在劳动市场上挣足收入者均应通过社会援助、社会转移计划或就业保障计划享有最低收入保障；

(d) 所有老年和残疾居民均应通过老年人和残疾人最低养恤金，享有不低于国家划定贫穷线的收入保障。

132. 社会保护制度可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现金和实物转移、就业保障计划(见方框 11)、农民天气保险、母子营养方案和学校供餐方案。由于这些方案针对具体对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比其他形式，例如整个经济体范围的粮食或燃料补贴等形式更易于负担，后者往往效率低，产生不必要的费用，而且在广泛经济意义上造成扭曲性影响。

建议 23

133. 各国应适当作出国家努力并提供适当的能力、资金和技术，力求确保所有公民都有机会进入基本安全网。

2. 减少灾害风险和适应

134. 适应的一个特别重要方面是复原力，即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特别是应对与干旱、海平面升高、气温升高和极端气候事件相关灾害的能力。减少灾害风险的含义远不仅仅是应急管理，相反，为了达到全面效果，必须将减少灾害风险纳入所有发展部门，而且其中必须同时包括避免灾害的措施和灾害发生时减轻损害影响的措施。这对于非洲等地的最脆弱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尤为关键。

135. 近年来，全球对减少灾害风险的关注稳步增加。全球为帮助各国和社区增强灾后复原力并更好地处理威胁发展的危险作出了各种努力，其中，关于减少灾害

风险的《兵库行动框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里程碑。在重大灾害损失报告中，绝大多数(97%)与气候有关。相对于人口不断增长的趋势而言，死亡总人数显著减少，然而经济代价却普遍上升，每年达到2 000亿美元以上，代价最高的是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年)。鉴于缺乏经常更新的气候相关风险定量评估，正在开发新的工具解决这一问题，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是其中很有希望的一例。

建议 24

136. 各国政府应制订和执行有关政策，以管理转型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并增强复原力——特别是通过有的放矢的社会保护方案和政策，以及适当扩充人道主义能力，应对不断增加的环境压力和可能发生的冲击。

建议 25

137.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应加快努力，编写区域风险和脆弱性评估，制订预防对社会和自然体系产生不利影响的适当防备战略，这些战略应充分重视人民的需要，优先满足非洲、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建议 26

138.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应增加向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行动分配的资源，并将复原力规划纳入各自的发展预算和战略。

四. 努力实现可持续经济

139. 为了实现可持续性，必须进行全球经济转型。零敲碎打不会奏效。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很多人质疑现今全球经济治理的成效，但它也带来了彻底改革和果断转向绿色增长的契机，而绿色增长对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中的可持续发展都有裨益。

140. 然而，挑战是复杂的，不仅仅是通过加快增长走出经济危机。恢复增长的确至关重要——它关系到减少失业、帮助数亿民众摆脱贫穷、为妇女提供更多机会以及产生社会保护制度所需的资源，但是，社会排斥和环境制约的现实表明，这一致富过程必须以真正的绿色增长为基础，否则可能会变成自身成功的牺牲品。

141. 绿色增长有可能成为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器。因此，尽管能源依然是经济的命脉，但绿色增长关系到推广和确保高效利用低碳和可再生能源。传统增长道路严重偏向短期利益，而绿色增长从一开始就明确着眼于长远效益。旧的增长模式将社会和环境成本排除在定价机制之外，而绿色经济力求将其包括在内，使价格发出准确的信号。传统增长只要求令人满意的经济回报，不重视投资去处，而绿色增长十分注重确保资金用于为今后更强的可持续发展成效奠定基础。

142. 为了加强社会包容性，必须促进妇女、青年和穷人体面就业。研究证明，性别差距最小、青年和穷人有机会获得教育和保健、经济和政治参与有充分保障的国

家也是较富裕、经济竞争力较强的国家。本节列出四个主要的政策行动领域：(a) 将社会和环境成本纳入货物和服务的监管和定价，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第 143-163 段)；(b) 建立日益重视长期目标的奖励性行进图(第 164-180 段)；(c) 建立伙伴关系，发挥新投资的杠杆作用(第 181-197 段)；(d) 制定一个衡量进展情况的共同框架(第 198-202 段)。

A. 包含社会和环境成本：监管和定价反映外差因素

143. 当今出售的大多数货物和服务都没有体现生产和消费全部成本。这些消极外差因素普遍存在于几乎每一个经济活动领域，如果不予纠正而任其发展，会导致市场失灵。

144. 反映资产、货物和服务全部成本的定价和监管制度是任何可持续经济的一个关键要素。虽然市场和私营部门将是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但政府在使用市场和非市场手段制订政策和价格信号方面应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45. 每天有数百万公司和数亿个人作出购买和投资决定，这些决定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前沿，随着“全球中产阶级”人数增长，他们的消费也应更具可持续性。

1. 为碳和生态服务定价

146. 化石燃料价格几乎从未包括各种消极外差因素，例如与生产和燃烧这类燃料相关的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全成本定价能够纠正这种现象。全成本定价通过掌握和明确货物和服务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实际成本，促使公司和消费者采取各种可持续做法，例如防止污染、提高能效和利用可再生能源，防患于未然。

方框 12

在阿尔卑斯山使用铁路并实行车辆收费：转向可持续的货物运输

为了既保护环境又不给贸易流通造成负担，瑞士采取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运输政策，大力鼓励货物运输使用铁路而不用公路。具体实行了两项措施：建设新的轨道和隧道系统(最长的为 57 公里)，新铁路连通阿尔卑斯山区，大大缩短了从北向南纵贯瑞士全境所需时间，从而便利了坐火车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行程；对瑞士境内或穿过瑞士的几乎每辆超 3.5 吨载货卡车实行与载重挂钩的重型车辆收费。收费数额根据行驶里程、车辆总毛重定额和车辆排放类别(“欧洲分类”)计算。所得收入的三分之二上交联邦当局，当局首先将其用作建设和维修高效铁路网所需资金，从而进一步推动从污染环境的道路运输转向绿色铁路运输。

十分突出的是，这项政策并非自上而下，而是经过投票箱检验的。新铁路线的建设和重型车辆收费的实行都通过全民投票得到瑞士人民支持。

资料来源：BLS AG Infrastruktur。更多资料见：<http://www.bls.ch/e/infrastruktur/neat-konzept.php>。

147. 越来越多的政府已开始实行价格改革。特别是，有些政府已开始为碳定价，实行碳税或排放交易。直接和间接的碳定价是任何气候变化对策的一个关键要素，它不仅奖励保护、效率和需求方管理，而且有助于加强代用能源对高污染能源的竞争力，从而促进减排。对最重要的能源相关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实行征税将是另一个具有经济效益的外差因素处理手段。应该以不牺牲穷人利益的方式征税。

148. 政府还可以实行基于市场的创新机制，采取奖励措施，促使公司转向较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并着眼于长期获利能力。

方框 13

越来越多地利用排放交易

“上限和交易”排放交易制度使环境损害得以反映在市场价格中。规定排放上限可以保证实现所需的减排量，允许交易则使企业能够灵活选择成本最低的解决办法，同时也使对低碳技术和创新的投资得到回报。

上限和交易制度的运作方式是对管辖范围内的工厂或国家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规定上限，然后确定排放限额，作为通用交易货币。持有一个限额即依法有权排放 1 吨二氧化碳。如果某个公司或国家的实际排放量低于法定上限，可将其许可额卖给排放量超过上限的行为体，这样便可从二氧化碳节余中获利。

上限和交易制度已在欧洲联盟、挪威、新西兰、瑞士和美国东北部几个州实行。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大韩民国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和加拿大一些省份也在制订和实施上限和交易制度，日本和其他地方正在对此进行辩论。

在通过拍卖分配排放限额的地方，排放限额成为一种重要的收入来源，可用于资助气候行动或其他公益活动，欧洲联盟排放交易计划和美国东北部区域温室气体倡议体系已经部分实行这种办法。

2005 年启动的欧洲联盟排放交易制度是最大的上限和交易制度，它管辖欧洲各地约 11 500 个设施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欧洲联盟约 40% 的温室气体排放。2008 至 2012 年，全欧洲联盟的上限为每年 20.81 亿个限额。允许在数量和质量限制下使用来自欧洲联盟以外(包括清洁发展机制和其他来源)的抵免额，这使欧洲联盟排放交易制度成为国际碳市场的重要驱动力，并对减排行动提供了明确的奖励。

印度正在三个大邦制订当地主要污染物排放交易制度，以此作为国内环境监管新办法。已在三个邦启动试验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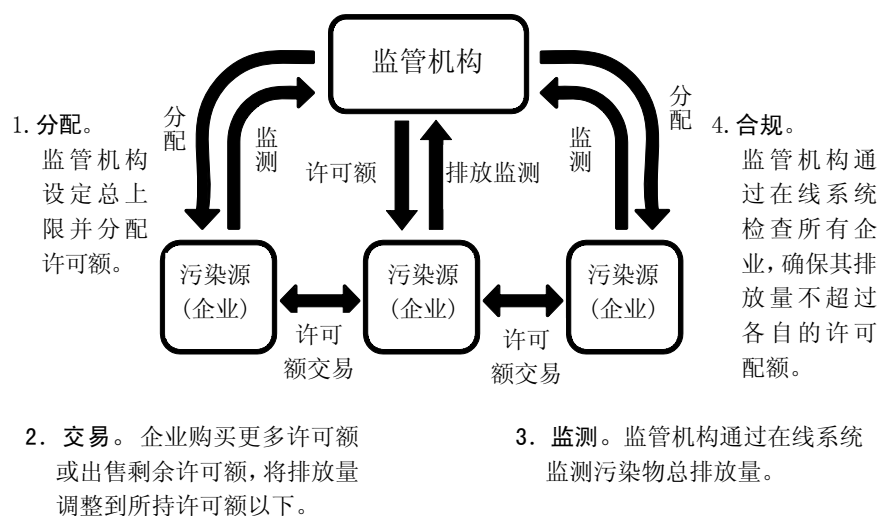
此外，印度还启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执行、实现、交易”机制，旨在鼓励国内 700 个最耗费能源的单位提高能源效率，并在这一过程中帮助减少印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2014/15 年以前每年减排 2 5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印度将硬

性规定，约 700 个最耗费能源的工业单位和发电站必须按特定百分比减少能耗。一个设施的减排百分比将取决于其目前的效率：一个部门中效率最高的设施可按较低百分比减少能耗，效率较低的设施则必须按较高百分比减少能耗。

澳大利亚最近推出了碳定价机制，作为清洁能源未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未来的国家繁荣奠定基础。社会公平是该机制的关键因素，它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支助，帮助他们应对碳价格的影响。

中国在五个城市和两个省启动了排放交易试验项目，目的是最迟于 2015 年逐步建立区域碳排放交易制度。

印度的市场机制



资料来源：欧洲联盟委员会和印度政府。更多资料见：<http://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index-en.htm>和<http://moef.nic.in/modules/others/?f=mfes>。

149. 公共和私营部门也日益认识到土壤肥力、水质、废物分解和碳固存等各种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2005 年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和 2009 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报告项目有助于界定和重视自然系统提供的宝贵服务并提高对这种服务的认识。这方面的进展可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减缓全世界森林的毁坏，而且确保至关重要的农业增产不以生态健全为代价。

150. 为了奖励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毁林、恢复森林、保护集水或减少土壤流失，同时刺激经济增长并减少贫穷，世界各地已在实行规定为生态服务付款的计划。实例包括：

(a) 国家一级，美国的养护保留区方案、中国的退耕还林方案、肯尼亚的绿水抵免计划和墨西哥的国家森林委员会计划；

(b) 区域一级，欧洲联盟农业和森林环境计划(价值为每年 20 亿欧元)；

(c) 国际一级，降低因森林砍伐和退化所产生的排放(降排加)方案。

方框 14

绿色补贴

“绿色补贴”是巴西为消除贫穷制定的“巴西无贫穷”计划范围内的一项国家方案。该方案向承诺在自己居住和工作所在地区促进环保的赤贫家庭发放补贴金。该方案包括季度直接付款和森林管理环保能力建设。绿色补贴方案初期阶段的目标是惠及居住在保护单位和含有重要森林资源的土地改革定居地的近 73 000 个小农户和其他传统社区。

资料来源：巴西政府。

2. 减少低效补贴

151. 大多数国家没有对外差因素充分定价，甚至政府还往往补贴那些造成消极外差因素的经济部门。全世界补贴最多的三大部门是农业、能源和渔业。2009 年，世界各国政府支出约 3 120 亿美元补贴化石燃料消费，另外支出 1 000 亿美元补贴化石燃料生产。同一年，仅经合组织国家就支出 3 840 亿美元补贴农业生产和消费。

152. 这些补贴不仅代价高昂，而且扭曲贸易市场，损害环境，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阻碍减贫。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资料，2010 年的化石燃料消费补贴只有 8%惠及最穷的 20%人口。

153. 尽管 20 国集团政府在确认这些补贴的成本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如果采取目标更长远的行动，应该可以取得更大成效。减少化石燃料补贴将大大缩小可再生能源与高碳能源之间的价格差异。据国际能源署估计，如果在 2020 年以前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其影响将包括：

(a) 到 2020 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减少 5%，相当于目前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大韩民国能源消耗量的总和；

(b) 到 2020 年，全球每日石油需求减少 650 万桶，主要是运输部门石油需求减少，相当于目前美国石油需求量的约三分之一；

(c) 到 2020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6.9%(2.4 千兆吨)，相当于目前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排放量的总和。

154. 各国政府面临更大的减少公共开支的压力，这也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契机，可以借此减少或取消那些未能反映自然和社会资源经济价值的有害无益的补贴。

155. 必须以不牺牲穷人利益的方式减少补贴，所涉产品或服务为基本必需项目时尤其如此。需要谨慎考虑削减补贴的先后次序：穷人依赖程度最低的补贴应该先予削减，同时应根据需要提供针对最穷和最脆弱人群的支助。

3. 可持续政府采购

156. 政府还可以通过可持续政府采购政策来修改价格信号。政府是一个经济体中最大的消费者。公共部门的预算支出平均有 45%至 65%用于政府采购。这在高收入国家占国内总产值的 13%至 17%，在其他国家所占比例甚至更高。这项支出可用来制定采购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和环境标准，而且可以提供一个大到足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的市场。

157. 最近在实行可持续政府采购方面取得的成功表明，政府能对私营部门产生重大影响，可以鼓励企业投资于新产品开发、重塑企业价值链并建立公共部门以外的新产品市场。例证之一是大韩民国关于政府采购绿色产品的强制性政策(见方框 15)。

方框 15

大韩民国绿色政府采购战略

大韩民国政府认识到，采购产品和服务是实现国家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在先前于 1994 年推出的生态标签制度的基础上，政府于 2004 年推出了一项针对公共机构的强制性生态友好采购计划。

这项绿色产品采购政策促使各公司为进入市场展开环境竞争，而且有助于加强环境责任、改善价格和质量并加快发展绿色技术。

大韩民国生态标签产品的生产规模也显著增长，从 2004 年的 15 亿美元增加到 2009 年的 170 亿美元。2004 至 2009 年，公共机构通过政府采购服务购买的产品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约 200 万吨，经济效益总额约为 2 700 万美元。

资料来源：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

4. 创新性筹资来源

158. 可以在全球、区域或国家一级利用其他创新性筹资来源，以确定外差因素代价，并将其作为一种创收方式，创造的收入可用于资助可持续性的其他方面。改革税收制度，将税赋从就业转移到消费和资源使用上，可有助于刺激改善资源使用效率的绿色增长。通过减税奖励可持续行为也会非常有效。

159. 如以往的努力所显示的，尽管各国在政治上接受创新性筹资来源和新的财政措施的程度不一，但近几年来，人们却特别关注在全球一级使用这种做法的可能性。小组讨论了进一步探讨创新筹资新领域的必要性，并一致认为有此需要。比如说，可以在秘书长气候变化筹资高级别咨询小组的工作基础上进行这项工作。咨询小组已经确认了若干来源类别(见方框 16)。

160. 全球经济的一些重要部门虽然制造了外差因素，其中包括国际海运和空运部门燃烧矿物燃料产生的排放，但目前并未对它们课税。对二氧化碳这一与能源有关的最重要温室气体课税是解决外差因素问题的另一个具有经济效益的手段。

方框 16

气候变化筹资高级别咨询小组计算的创新性筹资来源，2020 年估计数

(10 亿美元)

	低碳价格	中碳价格	高碳价格
1. 作为赠款的公共资金			
(a) 公共碳市场收入			
分配数量单位拍卖和排放交易制度拍卖	2-8	8-38	14-70
补偿税	0-1	1-5	3-15
(b) 国际运输税			
海运	2-6	4-9	8-19
空运	1-2	2-3	3-6
(c) 与碳有关的收入			
碳税		10	
附加电费		5	
取消矿物燃料补贴(二十国集团的承诺)		3-8	
矿物燃料开采权使用费转用		10	
(d) 金融交易税		2-27	
(e) 直接预算援助		200-400	
2. 开发银行票据		毛杠杆系数×3.5(净×1.1)	
3. 私人资本(总流量)		100-200	
4. 碳市场补偿	8-12	38-50	150

资料来源：秘书长气候变化筹资问题高级别咨询小组的报告，可查阅：www.un.org/climatechange/agf。

建议 27

161. 政府应该制定重视可持续性的价格信号，以指导家庭、企业和公共部门的消费和投资决定。具体地说，政府可以：

(a) 通过税收、条例或排放贸易计划等机制，至迟在 2020 年制定自然资源和外差因素定价(包括碳定价)文书；

(b) 确保拟订的政策反映因让妇女、青年和穷人充分参与经济并为经济作出贡献而产生的积极效益。这些政策还应说明经济、环境和社会成本；

(c) 改革国家的财政和信贷制度，以便长期奖励可持续做法，并劝阻不可持续的行为；

(d) 在水的使用、农作、渔业和林业系统等领域中，制定和扩大支付生态系统服务的国家和国际计划；

(e) 解决扭曲家庭、企业和公共部门消费和投资决定并削弱可持续价值的价格信号问题。政府应该朝透明地公布所有补贴的方向努力，并应该查明和取消对自然、环境和社会资源造成最大损害的补贴；

(f) 至迟在 2020 年逐步取消矿物燃料补贴，并减少其他不正当或扭曲贸易的补贴。如果涉及的是必不可少的货物或服务，则必须以保护穷人和方便受影响群体过渡的方式减少补贴。

建议 28

162. 各国政府和大学等其他公共机构和国际组织应该为其采购制定可持续发展标准，以便在未来的十年中，向成本效益好的可持续采购转变，并应该从 2015 年开始，就其进展发表公开的年度报告。

建议 29

163. 各国政府应该为生产和开采资源制定标准，以利于向可持续全球经济过渡。各国政府还应鼓励企业广泛采取和利用来自国际协定和公约的可持续自愿原则。

B. 制作一张日益重视长期目标的奖惩路线图**1. 公司问责**

164. 世界各地的公司正在采取负责的业务做法方面取得进展，但在执行方面仍有很大差距。全球契约是秘书长为承诺使其经营和战略符合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领域中 10 项公认原则的企业制定的战略性政策举措。

165. 私营部门中也存在若干可帮助投资者、公司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衡量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其他自愿计划。例如，全球汇报计划和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为公司报

告环境和社会业绩提供了模板。碳排放披露项目向投资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有关公司的碳负债信息。最近，一些公司首次引进了环境损益账户，详细记载为了向消费者提供产品而使用的自然资源的全部经济成本和所造成的环境影响。

166. 但是，这种报告措施的利用率依然有限：目前，《财富》月刊所列的 250 家公司中只有 3% 采用综合报告方法。这种报告的目的是向投资者和监管人员提供一份单一报告，介绍公司在各经济因素方面的总体业绩以及环境、社会和管理做法。为了成就真正的变革，应该考虑硬性规定提交报告。

167. 资本市场可以鼓励公司改善报告方式，从而在推动这一变革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最近在土耳其推出可持续指数的尝试为这方面取得进展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实例(见方框 17)。

方框 17

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自愿参与可持续性报告

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和土耳其促进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推出了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可持续指数。该项目的目的是审查在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管理其可持续性问题情况，并且创建一个可以显示土耳其上市公司带头作用的指数。

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可持续指数力求提高可持续先锋的知名度，从而为领先的土耳其公司提供竞争优势。该项目将为在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制定一个指数，以其为基准，鼓励土耳其大公司并使其能够在公司环境和社会管理业绩是争取永久成功的必要条件的世界上成功竞争。

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可持续指数是发展最佳做法的一个多个利益攸关方项目，目的是为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及其投资者推出一个土耳其的可持续基准。

资料来源：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可持续指数。详情可见 http://www.isesi.org/ISESI_ENG/About_ISESI.html。

2. 鼓励较为长期的投资

168. 要向可持续发展过渡，就要有大量资本。来自不同方面的估计数(Stern、环境署和经合组织)表明，每年需要的数额约为全球国内总产值的 0.5% 至 2.5%。

169. 其中有一些可来自政府每年可从其支付的近 1 万亿美元的补贴中节省下来的数额。一些可来自调配一部分政府每年为采购货物和服务支付的 5 万亿美元的数额。一些将来自官方发展援助，估计目前为每年 1 300 亿美元。但这些新资源中将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私人资本。

170. 虽然加强公司关于可持续性的报告可以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信息，并据此作出投资决定，但并非一定能改变投资者本人的行为。要改变投资者本人的行为，尤其是鉴于最近的金融危机和对金融部门短期前景的普遍看法，需要审查一下投资者的信托责任。

171. 可持续发展要求投资者进行较为长期的投资并有耐心。经验表明，目前的金融危机至少有一部分起因是投资者过分注重“短期”和季度结果。这就为国际金融改革和可持续发展两者齐头并进展现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172. 政府需要采取行动，鼓励公私养恤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进行较为长期的投资，这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国家关于“信托责任”的立法规定常常使它们不能这样做。

173. 最近，我们看到资信评级机构的决定对主权债务和私人债务的影响。一些机构在环境署的领导下发挥重要作用，推动资信评级机构在今后评级时考虑可持续发展。

174. 在这方面，主权财富基金也很重要。目前这种基金的总资产有近3万亿美元，而且预计到2013年时将达到6万亿至10万亿美元。仅2005年以来，就建立了12个新的主权财富基金。这些主权财富基金混合了商业和公共/国家利益，具有相当的长期投资潜力，因此能够更充分地考虑可持续性问题，并且某些基金甚至将可持续性作为一个明确的政策目标。挪威政府的养恤基金就是这方面的最佳做法典范。

175. 通过修改主权财富基金目前的“优良做法守则”——圣地亚哥原则，可以推动这种做法。这相当于改变国家和国际公共养恤基金的管理，使它们能够更负责地进行投资。

176. 如果双边捐助者、国际机构、开发银行和出口信贷机构的部门发展方案和政策不充分考虑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视野，就可能支离破碎。推动经济调整可以对环境和社会问题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他们必须力求对可持续发展采取统筹做法，并充分监测其政策产生的结果。目前已经推出各种举措，为贷款机关制定标准，诸如“赤道原则”（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关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性的业绩标准和世界银行集团环境、卫生和安全导则制定）。这些努力和其他努力可成为更广泛考虑的有用典范。

建议 30

177. 政府应该促进并鼓励公司将长期可持续发展标准纳入投资和交易（包括金融交易）评估。企业集团应该与政府和国际机构一起，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框架，并应该考虑硬性规定市场资本总额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提交报告。

建议 31

178. 企业应该力求使其业务做法符合普遍接受的人权、劳工、环境可持续性和反腐原则，如全球契约规定的原则。

建议 32

179. 鉴于大量的私人资本和主权资本对向可持续发展过渡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呼吁以下实体探索一系列措施，以适用可持续发展标准，这些措施包括：

(a) 主权财富基金董事会、国家和国际公共养恤基金董事会以及其他主要金融机构在投资决定中使用上述标准；

(b) 政府或股票市场监管人员通过或订正各项条例，以鼓励使用上述标准；

(c) 证券交易所推动各方使用这些标准，分析公司和公司关于遵守法规情况的报告；

(d) 政府制定奖惩措施，并创造有利环境，使董事会关注这些标准(信托责任)；

(e) 政府和资信评级机构将这些标准纳入各自的风险评估。

建议 33

180. 政府、国际机构和国际开发银行应加紧努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并充分评估和监测其政策在社会和环境领域产生的结果。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和出口信贷机构应该在考虑国家风险时，适用可持续发展标准。

C. 建立伙伴关系，发挥新投资的杠杆作用

181. 虽然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公共部门资金依然重要而且有此需要(2010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为 1 287 亿美元)，但显然对私营部门的资金需求也将十分巨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在过去几年的谈判中认识到需要扩大融资，商定在 2020 年之前，每年筹集 1 000 亿美元的公私资金。但这只是所需投资的一部分：国际能源署估计，仅能源部门今后几十年就需要数万亿美元的投资才能满足需要。

182. 过去几年中，为了减少投资风险，优化使用公私来源的资金，集合人力资源和战略能力，公私部门发展了若干创造性的伙伴关系。从业人员越来越认识到，这种伙伴关系可对扩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努力发挥重要作用。公私部门的战略伙伴关系对进行可持续发展投资越来越有影响。这些伙伴关系的参加者同意在开始设计战略方案时就进行合作，而不是在开展独立项目时才合作。

183. 可持续发展的很大一部分挑战将是改变花钱方式，而不光是多花钱。需要投资的许多领域有相当程度的重叠：例如，适应气候变化的许多开支将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但即便如此，在将来实现减少贫穷和可持续成果的进程，仍将耗资巨大，并将需要进一步明确公私部门各自的作用。

184. 提供基础设施服务及其有关的筹资挑战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例如，随着全球日益城市化，将越来越需要对能源、水和交通等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以争取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目前有若干领域具备促进和利用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在能力。²

与微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及地方社区建立伙伴关系

185. 可能需要公共投资的一个领域是需要前期重投资的情形——例如，可持续技术将减少经营成本，但无法马上收回其最初的资本成本；又例如私人投资等其他手段需要假以时日才能产生足够的收益。必须小心平衡前期重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以避免产生穷人不得不承担预付资源费用负担的情况。

186. 公共投资至关重要的另一个领域是能力建设，以便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创造有利于市场的环境。与固定资本投资不同，私人资金通常不碰触这种投资，但这种投资的杠杆率很高，因为它们能使国家和国际的私人投资获得数倍收益。

187. 公共投资对社会回报高但却不能为追求利润的投资者提供足够的金融回报的项目尤其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分担风险、提供可行性差额资金³或承诺预购等政策，使项目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

188. 伙伴关系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一个特别领域是微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这些公司是增长、创造财富和就业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小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189. 无法获得资本是小企业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管理缺失和不能充分获得技术也是重大障碍。据估计，尽管小额金融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许多小企业依然难以获得信贷。

190. 小额金融可以通过提供小企业贷款、众人参加的借贷机制和安全的存钱机构，增强穷人的权能，从而有效地减少贫穷，而且小额金融在促进中小型企业以及减少穷人遭受贫穷和气候变化影响的风险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

191. 关键挑战是继续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快发展小额金融业，更好地利用新的电子技术，使小额金融业能够帮助越来越穷和越来越边远的人民，尤其是帮助农村地区的人民，并减少成本。银行等融资系统主流行为体也须更积极地向小企业提供贷款。

192. 长期以来，伙伴关系被视为是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市场(近来)的任务。但如今，如果不将地方政府和妇女自助团体等地方社区组织包括在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前列，就不可能取得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实质性进展。必须与这些组织磋商，争取它们加入，并在许多情况下呼吁它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政策和建立伙伴关系。

² 基础设施资产可定义为一国或区域内的公共工程系统，包括道路、电线、瓦斯和水管以及铁路。私营部门通常采取从长计议的项目出资方式，为公共基础设施出资。

³ 提供可行性差额资金最常见的是指在通过公私伙伴关系进行基础设施项目时，公共部门以赠款方式向私人伙伴提供财政支助，以使项目具有商业可行性。

建议 34

193. 政府和企业应该与地方社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进行可持续发展投资。

建议 35

194. 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大公司应该协同努力，制定奖励措施，促进增加对可持续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途径包括：制定政策和目标，减少投资者的顾虑；推动发展支持研发的公私网络；发展风险担保机制和提供风险资本；提供种子资金。

建议 36

195. 政府应该利用公共投资建立有利框架，促进私营部门大幅度增加供资，例如，可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分担风险，提供可行性差额资金和承诺预购等途径建立这种框架。

建议 37

196. 政府应该设法鼓励投资者对可持续发展进行投资，为此应特别通过多多使用分担风险机制以及加强长期监管和政策环境的确定性的方式，影响投资者对未来的盘算。这方面的措施可以包括借助《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或提供公共资金的长期前景，为可持续能源或养护、废物减量、节约用水、碳市场准入确立目标。

建议 38

197. 政府和金融部门应该发展新型伙伴关系，以进行能力建设，增加获得资本的机会，从而激励中小型企业，使它们能够参与可持续新经济。

D. 建立衡量进展的共同框架

198. 长期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国产总值)垄断了经济思维，而且成为衡量国民经济业绩和政治人物工作成效的试金石。但这一成就标准越来越受到新思维的挑战，其中包括 1987 年的布伦特兰报告，人类发展指数以及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建立、约瑟夫·施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和让-保罗·菲图西领导的经济业绩和社会进展衡量委员会。一些国家努力将幸福和安康纳入国家进展指标，这也是重要步骤。

199. 虽然物质繁荣很重要，但远不是安康的唯一决定因素。正如经济业绩和社会进展衡量委员会在 2009 年报告中指出，纯粹的经济指标丝毫不能表明物质福利是否是以环境和社会影响为代价获得的，或是在可能对自然资源过度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获得的。

200. 至于公式的环境这一边，在如何衡量环境状况、生态系统完整程度以及一切照旧会有多大风险等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这些经验可用于制定可持续发展指数或一整套可持续指标。联合国(环境署的双年度报告《全球环境展望》

以及将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环境影响与经济增长脱钩的报告)以及包括印度在内许多国家开展的“绿色”国产总值方案、经合组织的环境指标、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生态系统经济以及生物多样性研究和生态足迹研究(诸如墨西哥的研究)是如何衡量生态系统完整程度的一些范例。

201.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系统地转变全球经济,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进步,经济增长是否真是衡量进步的最佳手段。为了使生产和消费与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环境退化脱钩,应该用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指数或指标补充国产总值的狭隘概念。但不应将确认可持续发展指数或一整套可持续发展指标作为实行惩罚或建立贸易壁垒的手段。

建议 39

202. 为了衡量可持续发展的进展,应该至迟在 2014 年制定一个可持续发展指数或一整套指标。为此,秘书长应该任命一个包括有关利益攸关者在内的技术工作队。

五. 加强机构治理

203. 如本报告前几节所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确立有效机构框架和决策过程。然而,在现实中,通常看到的往往是围绕“孤岛”式单个问题建立的分散机构;领导力不足,同时缺乏政治空间;没有适应新挑战和危机的灵活性;未就挑战和机遇进行预测和规划——所有这些均既损害决策又损害实地执行工作。

204. 与此同时,参与治理的行为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样化。非国家行为体凭借自身实力成为主要参与者,并熟练使用新媒体和社交网络技术来制定议程。同时,私营部门实体有能力调动大量资源,对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205. 因此,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结成联盟的做法在决策和执行中越来越普遍——其基础是务实地承认,要有效地解决问题,就必须大力增强协作和灵活性。那么,除发挥赋予合法性这一独特作用外,各国政府和国家机构的关键作用就是如何设定议程,并创建可建设性地开展此种协作的治理框架。

206. 本节探讨治理和协调问题各方面,以促进国家及全球各级的可持续发展。本节还特别强调让所有行为体承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本节提出的许多建议旨在加强各决策层的问责。本节特别呼吁:(a) 想办法改善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协调和问责(第 207-219 段);(b) 想办法改善区域和全球各级的协调和问责(第 220-236 段);(c) 确立一套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第 237-245 段);(d) 定期提出全球可持续发展展望报告,以便将各问题联系起来,并鼓励各机构在国际一级进行协调(第 246-255 段);(e) 重新作出加强国际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包括考虑设立全球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 256-267 段)。

A. 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协调和问责

207. 善治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善治的基础是：民主、法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男女平等、获得信息、公正以及政治参与。必须鼓励青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和经济。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政策也很重要，因为腐败和犯罪行为给社会和经济造成损害。

208. 如果说善治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发展基础，协调则是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各部委和机构各自为政的结果是，工作和资源分散，错失解决可持续发展挑战的机遇，因为这些挑战是相互联系的。

209. 例如，在某种程度上，使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完全独立于农业、用水管理或保健领域可能是明智的，因为这些领域分属各部委。但在现实的家庭和社区生活中，复杂的联系网、反馈循环和涟漪效应使这些领域彼此紧密联系。

210. 因此，解决机构分散问题的第一步必须从最高层开始——就可持续发展问题采取真正的整体政府办法。包括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内阁在内的上层集体发出信号和发挥领导力至关重要。可持续发展是个非常宽泛和复杂的问题，任何一个部委或机构都无法单独处理。此问题需要所有处理经济、社会和环境交叉问题的各方的参与。如果政府首脑明确表示应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政府各实体工作的主流，并明确表示希望各部长关注并一起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可产生实际效果。

方框 18

挪威的可持续发展治理

挪威财政部负责协调挪威政府的可持续发展工作，包括涉及可持续发展经济、环境和社会层面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为落实该战略，挪威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政府最重要的政策文件——《国家年度预算》。在各年度预算中，专门有一章报告后续行动，各部委和统计局都为此作出贡献。这是监测进展的重要工具。

2003年12月，挪威政府任命了一个专家委员会，其任务是拟订一套挪威可持续发展指标。财政部征求了大众关于最初16个指标的意见，此后，财政部在2006年国家预算中提出了略经修订的一套指标。该套指标现由18个指标组成，在监测挪威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各部委也在其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报告中使用该套指标。

资料来源：挪威政府。有关挪威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的更多信息可查阅 <http://www.regjeringen.no/upload/FIN/rapporter/R-0617E.pdf>。有关该套可持续发展指标的信息可查阅 <http://www.ssb.no/english/magazine/art-2006-11-09-01-en.html>。

211. 统筹预算是推动政府各部门协调的极有力手段，例如，按战略目标来配置资源而不是将资源分配给各部委或部门。这种“根据目标进行管理”的方法有助于让政府各部门和机构主动关注如何支助跨政府部门的目标；而部门预算则起到相反的作用，即各部门努力保护本部门预算和“地盘”不受侵犯。方框 19 载列了改善政策协调的一系列其他机制。

方框 19

政策协调机制

政府领导人可利用持续增加的一系列决策方案来改善政策协调：

- 高级别协调机构，例如，印度计划委员会(总理领导，其具体目标是克服各部各自为政的“筒仓式”做法)、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土耳其高级规划委员会和南非国家规划委员会。其他例子包括：巴巴多斯社会伙伴关系倡议，该倡议由总理担任主席，汇聚了各部长、雇主和工会，目的是解决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重大挑战；瑞士联邦政府不设总理，其结构中固有的跨部门办法为所有政策问题的集体决策以及所有政府成员共担执行责任提供了便利。
-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支持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计划和战略获得议会广泛的政治支持，并使所有相关的利益攸关方(包括私营部门、民间社会以及地方和区域当局)结成广泛的伙伴关系。这种计划和战略应纳入以下问题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消除贫穷、创造就业机会、减少不平等、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能源、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绿色增长等。这些计划和战略还应包括超越较短的选举周期的具体承诺，并包括监测和问责规定。
- 外交部肩负着与经济部门各部协调国家外交政策的责任，以确保在国际论坛上更一致地代表本国立场。瑞典外交部和国际发展合作大臣负责协调并建立瑞典政府政策的一致性以促进发展，并于 2003 年获得议会一致通过。
- 决策者和科学界之间更好地交流，这反过来可促进更深入地了解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原因和影响，并找出解决这些挑战的有效新方法。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以及联合王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都是利用此种办法的有益范例。

212. 预算过程各阶段应纳入可持续发展视角，包括编制最初的拟议预算阶段以及此后的预算执行阶段。可从国际商定的目标以及其他的国家或国际社会、经济和环境标准来了解可持续发展视角。世界各地议会具有使政府承担责任以及审查政策和审批预算的特殊作用，因此，议会在确保履行可持续发展承诺方面具有特殊责任。

213. 各区域、州和市各级地方当局也可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国以下各级是处理许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前沿。对于城市来讲尤其如此，世界上半多人口现都生活在城市。世界各地正出现“绿色”城市，城市领导经常绕过本国的繁文缛节和政治，开展跨界合作。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全球“C40 城市”和欧洲联盟的“市长盟约”等倡议，地方和区域当局可通过这些倡议自愿承诺提高能效和利用可再生能源。

214. 中央和地方政府可出台支持性法律框架，配置资源并提供专门技能，以便补充当地筹集的资金和专业知识，从而在决定这些倡议的成败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能力建设方案可大大提高地方政府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识，并为其提供可利用的实用工具。例如，有效的空间规划可产生深思熟虑的安置和建设政策，从而增加运输和住房能效，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甚至可通过使民众（往往是社会边缘化群体）生活在远离危险排放源或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来改善公共健康。鼓励城市之间和地方当局之间开展良性竞争也可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可通过国家或国际可持续发展奖来开展这项工作；如 2012 年欧洲绿色首都奖颁给了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的 Victoria-Gasteiz 市，该市重视能效、节约用水、废物综合管理、公共交通和民间社会参与。

建议 40

215. 各国政府应确保法治、善治和公民获得官方资料的权利，公众参与决策和平等诉诸法律的机会，以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建议 41

216. 各国政府应使青年人能够参与并影响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的决策过程。此外，应鼓励开展协商进程和对话，以便纳入来自互联网论坛和影响舆论的博客等非传统网络和青年社区的意见。

建议 42

217. 各国政府应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领导下，采取整体政府做法，处理可持续发展问题，并让所有相关部委参与，以便跨部门解决这些问题。

建议 43

218. 各国政府和议会应将可持续发展视角纳入其战略、立法，尤其是预算流程。为此，政府和议会应考虑消除贫穷、创造就业机会、减少不平等、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能源、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绿色增长等问题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政府和议会应探讨如何将具体的可持续性因素纳入预算监督范围，公开报道相关活动，以及使公民了解预算。

建议 44

219. 应采取措施加强决策和科学之间的联系，促进就可持续发展问题做出知情的政治决策。处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相关国家或地方机构可吸纳科学界代表为成员或顾问。

B. 区域和全球各级的协调和问责

220. 国际一级的问责和协调对于促进可持续发展也必不可少。国际机构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协调和促进集体行动，使国家一级的决定和执行行动产生更大效果。

221. 在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时，信任和互助必不可少。这意味着找到适应各国和各区域不同能力和不同情况的富有成效的新方法；也意味着为与关键商定发展目标(如将国民总收入 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相关的行动和承诺注入新活力。

222. 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各方应实现公平，这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地球问题首脑会议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落实在行动中，但现在的情形却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一方坚持该原则中共同的责任，而另一方则坚持有区别的责任。

223. 信守承诺对建立信任至关重要。通常，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即使未履行承诺，也不用承担后果。应建立更有效的问责机制，以解决目前执行方面的缺陷。

224. 虽然机构分散可能最初出现在国家一级，国际一级也普遍如此；国际一级的许多机构和多个协调机制缺乏顾全大局、协调努力的有效机制。这种分散往往导致制定未适当考虑更广泛可持续发展视角的部门发展方案和政策。例如，经济调整可对社会和环境问题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双边捐助方、国际机构和开发银行必须努力采取综合办法，处理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充分监督其政策结果。

225. 近年来，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已出现一些重要创新。几年前，许多政府努力开始就某些发展重点，尤其是就有关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发展重点采取“整体政府”的办法。联合国“一体行动”方法旨在使在发展中国家运作的联合国系统各实体更协调一致地交付服务；现在，该方法是全球推动增强援助实效和捐助方协调的更广泛工作的一部分。该举措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框架内采取的其他举措力求改善联合国系统(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在政策、管理和业务层面的机构间协调。但机构分散仍普遍存在，并非例外情况，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226. 治理方面一个新的重要挑战是使包括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更接近国际一级的决策核心。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在协商和决策过程中占一席之地尤为重要；该领域的成功解决方案取决于更广泛地利用各方承诺和资源。

227. 当然，这并非是一刀切的建议：这些行为体与某些问题的相关性较低而与另一些问题的相关性较高。此外，多个利益攸关方平台必须找到解决共同义务、监督、问责和合法性问题的方法。秘书长的“每个妇女每个儿童”和“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就是此种综合办法的范例，两个倡议均调动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参与者，目的是调动大量新资源，联合开展工作。

228.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新伙伴关系)、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单一市场和经济以及欧洲经济委员会《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奥胡斯公约》)等区域和次区域倡议和机制是创新来源,有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巨大潜力。

方框 20

波罗的海的多个利益攸关方合作

当今,从富营养化到有害废物等多种推动因素使波罗的海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海域——该问题不仅影响波罗的海生物多样性,还影响生活在岸边的 9 000 万人的健康和生计。

2010 年,芬兰总统与芬兰总理和波罗的海行动小组主席共同努力,于 2010 年 2 月 10 日在赫尔辛基举行波罗的海行动峰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欧洲联盟已在该地区开展广泛合作,并缔结了许多协议,以监管波罗的海的利用——但迄今为止,协议执行不力。因此,峰会的目的是召集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从政治上进行强有力的领导,促进更好地执行这些协议。

国家、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波罗的海行动峰会上提出了其解决波罗的海问题的承诺。目前正根据各参与方提供的里程碑信息积极监测这些已公开的承诺。

资料来源:芬兰政府外交部。更多信息可查阅 <http://www.bsas.fi/>。

229. 虽然从根本上看,可持续发展就是确认相互联系并就此采取行动,但其所谓的三个支柱——经济、社会和环境常常彼此孤立,甚至在每个支柱之内都缺乏协调。

230. 就经济政策而言,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金融和经济相关部委、中央银行和国际机构之间会有有效协作。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促进合作和改革金融部门以便使其更具复原力方面,金融稳定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所需的改革包括确保金融市场增强透明度,弥补在监管和监督某些金融产品及相关方面存在的漏洞,以及确保银行的资本储备足以应对其面临的风险。

231. 同时,社会政策分散,包括卫生、教育、劳动、人权和性别问题在内的从属领域也是各自为政的“筒仓式”做法——上述各领域都至少有一个专门解决此方面问题的联合国机构(有时是几个机构),但没有将各领域联系起来的实体。此外,虽然这些领域以及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之间确实存在关键的联系,但国际体系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些联系,因此也没有利用这些联系。

232. 最后,政策环境也同样分散,环境支柱薄弱。与环境有关的问题往往是各主管机构或部门的权限,国家一级缺乏对此问题的持续关注。国际层面存在类似挑战,国际上有涉及各种问题的数百个环境协议和角色重叠的各类机构。一个日渐增加的共识是,必须加强并简化环境体制结构。需要从以下方面支持此项工作:

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制定全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环境战略；增强协调的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协同作用和效率；加强能力建设；增强科学与政策之间的联系；促进区域一级的战略参与。

233. 以上工作大部分可通过加强环境署来完成，该想法近年来得到支持，有人还提出若干体制办法。一种办法是可将环境署转变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加强后的环境署可促进相关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协调，并将其工作更好地与发展机构的活动相结合，特别是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的活动相结合。

建议 45

234. 小组认识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普遍愿望，并认识到国情以及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的多样性。小组要求开展一项工作，研究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公平问题的概念及其适用性，以期将其成果纳入里约+20 进程及其后续进程。

建议 46

235. 双边捐助者、各国际机构和开发银行应加紧努力，全面促进可持续发展，并应定期监测和报告其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影响。⁴

建议 47

236. 国际可持续发展政策分散，尤其是环境支柱薄弱，因此应加强环境署。

C. 可持续发展目标

237. 自 2001 年推出千年发展目标以来，这些目标在激励各方为全球减贫提供支持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设定明确的进展目标，鼓励编制与贫困有关的新数据并作出额外的援助承诺。

238. 然而，还需要开展更多工作，以加快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如果各国政府能集体下定必须下定的决心，则某些具体目标——如 2015 年之前普及初等教育——仍可实现。需特别关注正在发生或刚刚摆脱冲突的低收入国家所面临的发展挑战，这些国家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落后得更远，这使其处境更脆弱，本国公民更不安全。

239. 2015 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最后期限很快来临，必须继续并加紧努力，专心解决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世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重要挑战比千年发展目标所涵盖的挑战更广泛，需就此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240. 我们相信，我们可借鉴千年发展目标经验，利用其成功之处，商定一组关键的可持续发展全球目标，帮助激励这些行动。应以补充千年发展目标的方式来确定上述目标，同时应考虑到 2015 年之后的后续框架。

⁴ 上文第四节提出了类似建议。但本节仍然列出该建议，因为该建议与全球和区域层面的治理和问责有关。

241. 任何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应以下列原则为基础：

- 应具有普遍性，涉及所有国家的挑战，而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 应体现广泛商定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
- 应纳入千年发展目标未充分涵盖的一些关键领域，如粮食安全、水、能源、绿色就业、体面工作和社会包容、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可持续城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海洋，以及减少灾害风险和复原力
- 应该全面，应同等地反映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
- 应纳入短期基准，而范围则应具有长期性，或许其最后期限可规划至 2030 年
- 应让当地社区、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等各利益攸关方与各国政府一起落实并调动资源
- 除绝对的具体目标外，还应包括衡量进展的尺度，以便使政策关注集中，以此来推动发展成果并反映各国和各地区不同的发展重点和条件
- 应考虑不断发展的科学证据，为审查这些目标留有余地

242. 目前已出台一些建议和倡议，有助于讨论任何一套可持续发展目标应涵盖哪些内容；如秘书长的“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见上文第三节)，其中提出了 2030 年之前要达到的涉及获得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的 3 个目标。能源可很好地说明贯穿各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挑战：普遍获得能源涉及社会层面，负担得起能源以及能效问题涉及经济层面，减排涉及环境层面——所有三个层面密切相关。

243. 必须由各国政府商定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开展公开、透明和包容的进程，利用不同的专门知识、经验和地域代表性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的经验，拟订必要的具体目标和指标。

建议 48

244. 各国政府应同意制定一套关键的可持续发展全球目标，其中包括可持续发展的所有三个层面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些目标应激励个人和集体采取行动，并补充千年发展目标，同时应考虑到 2015 年之后的框架。秘书长应设立专家机制，以拟订并完善这些目标，然后提交联合国会员国通过。

建议 49

245. 小组赞同秘书长的“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应毫不拖延地实施该倡议。

D. 全球可持续发展展望

246. 可持续发展决策必须以最佳、最新的证据为基础。过去 20 年，关于可持续发展各方面的数据和分析的质量大大提高，特别是就全球气候变化、能源、食品和农业、水、保健、性别平等、经济、就业、发展和环境等问题推出了一系列基准展望报告。然而，缺少一份能够发挥下列作用的综合报告：

- 汇集跨部门的评估
- 向决策者提供关于可持续发展各方面之间的协同作用和权衡的分析
- 确定机会领域和危险临界点领域
- 就可持续发展整个议程提供关于行动领域的建议

247. 我们认为，重要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实体有必要在秘书长的总体指导下共同编写并定期公布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展望报告。该报告将与全球科学界密切合作，利用所有相关领域的尖端知识，评估关键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指标状态及其相互关联。

248. 这类报告将侧重于全球趋势及其可能对世界各地民众产生的影响。报告每个版本都可围绕某一特定主题深入探讨，例如第一版可以水-食品-能源之间的关系为主题。

249. 除了汇集信息和分析外，编写展望报告也是为了促使各国际组织的官员共同努力，比较各自对未来的分析和假设，吸引外部专家(包括最优秀的科学顾问)，并与各国政府开展协商。反过来，这将在国际体系各领域之间创造宝贵的共同意识，从而为加强全球政策的连贯性提供动力。

250. 展望报告如要有效，就必须植根于现有政策进程，并可纳入国际机构和会议的议程，包括纳入全球可持续发展理事会(见下文)等潜在新机构的议程。除联合国机构外，报告还可以包括区域论坛(如非洲联盟首脑会议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机构(如 G-20)以及参与其编制工作的机构的管理委员会和其他相关机构。

251. 人类活动影响有许多方面，会产生各种后果，包括科学家们所指的“行星界限”、“环境阈值”和“临界点”，人类尚未详细了解这些后果。我们在许多方面积极地开展了科学探究活动，但仍然缺乏关于地球发展趋势的整体了解。在一些领域，人类正在努力协调研究成果，尤其是关于气候变化和臭氧消耗的研究成果。而在其他领域，科学并不是很发达，各种环境、经济和社会压力的复合影响也未得到充分理解。

252. 鉴于科学变化的速度，决策者往往无法了解科学对决策的影响。迫切需要将科学更好地纳入可持续发展各级决策当中。1988 年设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可能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该委员会在近 25 年的运作当中，不仅汇集

并审查了现有最佳科学数据，还成为了讨论问题的平台，为各国政府采取行动铺平道路。

253. 当前，时机已经成熟，应更广泛地开展更大胆的政府间努力，加强科学与政策之间的联系，并运用科学，确定决策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同样，我们需要加深对穷人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挑战的认识，同时认识到，不应当用起点定义增长上限。改进获得科学知识的渠道将加强联合国在这方面的能力。

建议 50

254. 秘书长应协同联合国有关机构、国际金融机构、私营部门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等有关国际组织的领袖，带头共同努力，定期编写全球可持续发展展望报告，汇集目前分散在不同机构的信息和评估，并以综合方式进行分析。

建议 51

255. 各国政府和科学界应采取切实步骤，包括发起一项重大全球科学倡议，加强政策和科学之间的联系。这应包括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定期编写关于“行星界限”、“临界点”和“环境阈值”等概念的科学评估和汇编。这将补充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其他科研工作，包括经济和社会方面，以改进有关不平等问题等社会经济因素的数据和知识。此外，秘书长应考虑任命一名首席科学顾问，或成立一个具备广泛知识和经验的科学咨询委员会，负责向他或她和联合国其他机构提供咨询。

E. 加强国际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

256. 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展望都有助于加强国际体系中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协调一致性，但事实上，可持续发展问题依然缺乏一个供各国政府讨论、汇集非政府行为体的贡献等所有元素的明确的主论坛。相关部委代表本国政府参与各多边机构的做法使得国际组织经常仅仅是解决多方面全球挑战中的某一个方面，而非通观全局。

257. 继 1992 年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之后，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目标是发挥这一综合作用，审视整个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惜，这一目标并未实现。相反，该委员会制定了僵硬的、按部门区分的议程，往往主要集中在环境方面，从而忽视了可持续发展的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方面。该委员会不止一次地陷入关于一般政治立场的零和谈判，削弱了其地位，淡化甚至无法取得任何审议成果。

258. 该委员会的另一缺陷是未能与联合国系统内外的执行机制建立有机联系。该委员会的上级机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同样未能以系统、权威的方式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259. 同时，全球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加深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更有必要采取一种新方法改善体制机制并找到解决方案。

260. 二十一世纪所需的体制架构必须能够：

(a) 促进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更好结合，设置议程，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并酌情为正在进行的、实时的活动创造条件；

(b) 具有较高的体制地位，其关联性足以吸引最高级别领导人的参与，其合法性获得普遍认可；

(c) 通过新工具，如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其他绩效指标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展望(见上文)，审查全球可持续发展状况，并审查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关键组成部分的进展，包括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进展；

(d) 评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表现，并促成建设性的同行评议，以鼓励各国解释自身政策，分享经验和教训，并履行承诺，同时承认各国的特殊情况；

(e) 评估政府间组织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

(f) 反映联合国会员国广泛的地理和政治代表性，吸引有关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充分参与，并确保来自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科学界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实质性参与；

(g) 鼓励各利益攸关方在优先领域建立创新伙伴关系，并审查其执行情况；

(h) 加强联合国各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一致性。

261. 为在国际一级实现这些目标，可能需要采取不同措施，包括更积极地利用现有机构。成立强有力的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理事会，以取代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将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这一机构改革将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理事会将全年定期举行会议，大大改善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的机构整合，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审查可持续发展的进展。理事会将设立同侪审查机制，鼓励各国本着建设性精神，解释自身政策，分享经验和教训，并履行承诺。理事会必须拥有具有广泛地理和政治代表性的成员，并吸引有关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以及来自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科学界的非国家行为体充分参与。

262. 新的理事会不应重复现有机构的角色和职能。该理事会可以作为大会的附属机构，取代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就如同人权理事会取代前人权委员会一样。这样无须修改《联合国宪章》。全球可持续发展理事会直接向大会报告，不过将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保持建设性关系。

建议 52

263. 各国政府应考虑成立全球可持续发展理事会，该理事会全年定期举行会议，以改善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的整合，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审查可持续发展的进展情况。该机构可以是大会的附属机构，取代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理事会将需

要拥有具有广泛地理和政治代表性的成员，并吸引有关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以及来自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科学界的非国家行为体充分参与。

建议 53

264. 该理事会应设立同侪审查机制，鼓励各国本着建设性精神，解释自身政策，分享经验和教训，并履行承诺。

建议 54

265. 各国政府还应更积极地利用现有机构，包括利用举行里约+20 会议的 2012 年至 2015 年这段时间，审慎地进行审查和试验，以便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纳入 2015 年后的任何发展框架和体制改革当中。

建议 55

266. 秘书长应加快制定联合国系统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加强协调一致性，更好地确定联合国各机构的职责，减少重叠和重复，加强对执行工作的问责。该战略应接受联合国所有有关机构和管理委员会的审查，并特别努力在共同参加所有委员会和进程的国家之间形成统一观点。

建议 56

267. 秘书长应充分利用联合国作为世界会晤地点的优势，当领袖们聚集一堂参加新一届大会开幕会议的时候，定期召开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高级别交流。应利用这些会议，汇集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国际机构的负责人以及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制定议程，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六. 结论：呼吁采取行动

268. 自《布伦特兰报告》向国际社会介绍可持续发展概念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自那时以来，世界已更深入地了解了我们面临的相互关联的挑战，并进一步认识到，事实上，可持续发展为人们选择自己的未来提供了最佳机会。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历史时机，做出正确选择，坚定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269. 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就三个关键领域的今后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给予人们权能，使其能够做出可持续的选择，努力实现可持续经济，并加强机构治理，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现在，采取积极的后续措施至关重要。该小组期待秘书长实施属于其职权范围的建议，并向整个联合国系统传达这一整套建议。该小组还期待秘书长和联合国组织利用联合国的召集力，在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倡导这些建议，包括向各级政府、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科学界和私营部门倡导这些建议。

270. 该小组与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会前进程的代表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了互动，并从中受益，希望本报告所载建议将有助于在里约热内卢产生富有成效的成果。除此之外，该小组的最大愿望是希望该报告能给世界上所有人带来灵感。

271. 该小组的成员来自 22 个国家。他们以专家身份提供服务，代表了不同的群体和观点。小组成员一致坚信，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采取报告所呼吁的各项行动将使未来更美好。

附件一

建议清单

有关增强人民作出可持续选择的能力的建议

1. 各国政府和国际捐助方应进一步努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消除贫穷并减少不平等现象，以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2. 各国政府应当尊重、维护和保障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和 1966 年《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承认的各项人权，包括直接或通过自由推选的代表参与政府管理的权利。
3. 各国政府应加快兑现改善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的承诺，包括通过废除歧视性法律、消除正式障碍、进行机构改革以及制定和实行创新措施，以消除那些构成阻碍因素的非正规做法和文化习俗。应当特别注重：
 - (a) 确保妇女全面、平等地参与和控制生产资料，为此应保障平等享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平等获得整个价值链上的信贷、金融和推广服务；
 - (b) 确保妇女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参加参与式、能顺应需要、平等和包容性的政治决策进程；
 - (c) 确保普及高质量而且负担得起的计划生育服务以及其他性权利和生殖权利及保健服务。
4. 各国政府应考虑设立一个全球教育基金。这个基金应旨在吸引来自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支持，从目前的世界银行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发展而来，而且其任务是到 2015 年缩小小学教育差距，以便能够真正有希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2。
5. 各国政府应加大实现到 2015 年普及初等教育的千年发展目标 2 的力度，并确定不迟于 2030 年普及高质量初等后和中等教育的目标，同时注重可持续增长和就业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6. 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相关国际发展合作伙伴应共同努力，提供职业培训、再培训及职业发展，以配合终身学习，从而弥补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部门中的技术短缺。它们应在这些努力中优先考虑妇女、年轻人和弱势群体。
7. 各国政府应实施并推进“绿色工作”和体面工作政策，作为其预算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一项优先工作，同时也为私营部门的新就业创造条件。
8. 各国政府和工商业应建立伙伴关系，为年轻企业家创业提供启动服务。
9. 雇主、政府和工会应对促进工作场所平等采取综合做法，包括实行不歧视原则；采取推动妇女担任领导角色的措施；针对工作与生活以及健康采取对性别有

敏感认识的政策；促成面向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教育、培训和专业发展；承诺衡量并公开通报进展情况。

10. 各国政府和工商业应认识到，确保妇女充分参与经济活动，可产生经济惠益，为此应制定经济政策，明确应对那些使妇女能力受限的独特挑战，特别是：

- (a) 允许女性农民获取土地和资源；
- (b) 改善妇女获得资本和金融服务的机会；
- (c) 改善通过贸易和技术援助方案及小额信贷进入市场的机会；
- (d) 支持妇女在公共和私营部门晋升为领导人。

11. 各国政府和其他公共当局应推动公开、透明、平衡和讲求科学的进程，促进制定能充分反映生产和消费影响的标签制度和其他机制，并与私营部门合作确保标签、公司报告和宣传内容准确、成本效益高且值得信赖，从而让消费者能够作出知情选择，特别是在对人类和自然系统影响重大的领域，同时不应制造贸易壁垒。

12. 各国政府应向消费者提供更易于获得、负担得起和有吸引力的可持续选择，为此应与私营部门一道，按照现有最佳技术并在不制造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制定可持续产品标准，同时也运用价格奖惩办法。

13. 各国政府和非政府实体应推广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消费概念。这些概念应纳入初等和中等教育课程。

14. 小组欢迎所有利益攸关方以相关经验和包括《地球宪章》在内各项文书为基础，在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里约+20)上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的道德层面，使各国政府在选择转向可持续发展时做到心中有数。

15.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应努力促成一场新的21世纪绿色革命，一场“长青革命”，其目标是把生产力至少提高一倍，同时大大减少资源使用量，并且避免生物多样性进一步丧失、表土流失以及水资源耗竭和污染，包括为此增加对农业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以确保实验室里的先进研究成果迅速应用到实地。各国政府应要求粮农组织与各主要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合作，启动和协调这项工作，因为该组织负有减轻世界粮食短缺问题的独特使命。

16. 各国政府应努力就可持续和负责任水土投资交易全球原则达成协议，包括持续努力推动负责任的农业投资，其中尤其应强调在确保环境可持续性的同时，保护依赖这些基本资源的贫困民众的权利和生计。

17. 各国政府应制订并加强水资源综合管理计划，同时充分铭记水资源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包括可供饮用以及用于卫生、农业、工业和能源业。

18. 各国政府应致力于在主要海洋生态系统建立区域海洋和沿海管理框架，包括：

- (a) 加强海洋和沿海管理合作，并让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
- (b) 各区域国家考虑到其本区域具体需要、生态系统和使用者，进行海洋和沿海规划，并辅以可靠的供资机制，以制订和实施这些规划；
- (c) 建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他沿海国海洋管理人员、决策者和科学人员的能力；
- (d) 加强监测和监视系统。

19.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应当在其运作的区域力求使其政策和做法与区域海洋的协调管理相一致并为其提供支持。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各国政府和海洋管理人员应重视采取注重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办法，以提高经济和环境效益。

20. 各国政府应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协作，确保到 2030 年普及能负担得起的可持续能源，并力求将能效提高速度和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所占份额翻一倍。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应通过奖励研究和开发活动以及投资于这些活动，推广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

21. 各国政府应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到 2025 年使公民特别是偏远地区公民能有机会使用技术，包括普及电信和宽带网络。

22. 应鼓励各国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大公司更广泛地参与注重创新和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国际合作，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并充分利用气候友好型技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发展绿色经济方面可发挥的潜在作用。在坎昆和德班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各项协议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可喜一步。

23. 各国应适当作出国家努力并提供适当的能力、资金和技术，力求确保所有公民都有机会进入基本安全网。

24. 各国政府应制订和执行有关政策，以管理转型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并增强复原力——特别是通过有的放矢的社会保护方案和政策，以及适当扩充人道主义能力，应对不断增加的环境压力和可能发生的冲击。

25.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应加快努力，编写区域风险和脆弱性评估，制订预防对社会和自然体系产生不利影响的适当防备战略，这些战略应充分重视人民的需要，优先满足非洲、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26.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应增加向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行动分配的资源，并将复原力规划纳入各自的发展预算和战略。

有关促成可持续经济的建议

27. 政府应该制定重视可持续性的价格信号，以指导家庭、企业和公共部门的消费和投资决定。具体地说，政府可以：

(a) 通过税收、条例或排放贸易计划等机制，至迟在 2020 年制定自然资源和外差因素定价(包括碳定价)文书；

(b) 确保拟订的政策反映因让妇女、青年和穷人充分参与经济并为经济作出贡献而产生的积极效益。这些政策还应说明经济、环境和社会成本；

(c) 改革国家的财政和信贷制度，以便长期奖励可持续做法，并劝阻不可持续的行为；

(d) 在水的使用、农作、渔业和林业系统等领域中，制定和扩大支付生态系统服务的国家和国际计划；

(e) 解决扭曲家庭、企业和公共部门消费和投资决定并削弱可持续价值的价格信号问题。政府应该朝透明地公布所有补贴的方向努力，并应该查明和取消对自然、环境和社会资源造成最大损害的补贴；

(f) 至迟在 2020 年逐步取消矿物燃料补贴，并减少其他不正当或扭曲贸易的补贴。如果涉及的是必不可少的货物或服务，则必须以保护穷人和方便受影响群体过渡的方式减少补贴。

28. 各国政府和大学等其他公共机构和国际组织应该为其采购制定可持续发展标准，以便在未来的十年中，向成本效益好的可持续采购转变，并应该从 2015 年开始，就其进展发表公开的年度报告。

29. 各国政府应该为生产和开采资源制定标准，以利于向可持续全球经济过渡。各国政府还应鼓励企业广泛采取和利用来自国际协定和公约的可持续自愿原则。

30. 政府应该促进并鼓励公司将长期可持续发展标准纳入投资和交易(包括金融交易)评估。企业集团应该与政府和国际机构一起，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框架，并应该考虑硬性规定市场资本总额超过 1 亿美元的公司提交报告。

31. 企业应该力求使其业务做法符合普遍接受的人权、劳工、环境可持续性和反腐原则，如全球契约规定的原则。

32. 鉴于大量的私人资本和主权资本对向可持续发展过渡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呼吁以下实体探索一系列措施，以适用可持续发展标准，这些措施包括：

(a) 主权财富基金董事会、国家和国际公共养恤基金董事会以及其他主要金融机构在投资决定中使用上述标准；

(b) 政府或股票市场监管人员通过或订正各项条例，以鼓励使用上述标准；

(c) 证券交易所推动各方使用这些标准，分析公司和公司关于遵守法规情况的报告；

(d) 政府制定奖惩措施，并创造有利环境，使董事会关注这些标准(信托责任)；

(e) 政府和资信评级机构将这些标准纳入各自的风险评估。

33. 政府、国际机构和国际开发银行应加紧努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并充分评估和监测其政策在社会和环境领域产生的结果。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和出口信贷机构应该在考虑国家风险时，适用可持续发展标准。

34. 政府和企业应该与地方社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进行可持续发展投资。

35. 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大公司应该协同努力，制定奖励措施，促进增加对可持续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途径包括：制定政策和目标，减少投资者的顾虑；推动发展支持研发的公私网络；发展风险担保机制和提供风险资本；提供种子资金。

36. 政府应该利用公共投资建立有利框架，促进私营部门大幅度增加供资，例如，可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分担风险，提供可行性差额资金和承诺预购等途径建立这种框架。

37. 政府应该设法鼓励投资者对可持续发展进行投资，为此应特别通过多多使用分担风险机制以及加强长期监管和政策环境的确定性的方式，影响投资者对未来的盘算。这方面的措施可以包括借助《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或提供公共资金的长期前景，为可持续能源或养护、废物减量、节约用水、碳市场准入确立目标。

38. 政府和金融部门应该发展新型伙伴关系，以进行能力建设，增加获得资本的机会，从而激励中小型企业，使它们能够参与可持续新经济。

39. 为了衡量可持续发展的进展，应该至迟在 2014 年制定一个可持续发展指数或一整套指标。为此，秘书长应该任命一个包括有关利益攸关者在内的技术工作队。

有关加强机构治理的建议

40. 各国政府应确保法治、善治和公民获得官方资料的权利，公众参与决策和平等诉诸法律的机会，以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41. 各国政府应使青年人能够参与并影响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的决策过程。此外，应鼓励开展协商进程和对话，以便纳入来自互联网论坛和影响舆论的博客等非传统网络和青年社区的意见。

42. 各国政府应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领导下，采取整体政府做法，处理可持续发展问题，并让所有相关部委参与，以便跨部门解决这些问题。

43. 各国政府和议会应将可持续发展视角纳入其战略、立法，尤其是预算流程。为此，政府和议会应考虑消除贫穷、创造就业机会、减少不平等、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能源、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绿色增长等问题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政府和议会应探讨如何将具体的可持续性因素纳入预算监督范围，公开报道相关活动，以及使公民了解预算。

44. 应采取措施加强决策和科学之间的联系，促进就可持续发展问题做出知情的政治决策。处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相关国家或地方机构可吸纳科学界代表为成员或顾问。
45. 小组认识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普遍愿望，并认识到国情以及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的多样性。小组要求开展一项工作，研究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公平问题的概念及其适用性，以期将其成果纳入里约+20 进程及其后续进程。
46. 双边捐助者、各国际机构和开发银行应加紧努力，全面促进可持续发展，并应定期监测和报告其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影响。
47. 国际可持续发展政策分散，尤其是环境支柱薄弱，因此应加强环境署。
48. 各国政府应同意制定一套关键的可持续发展全球目标，其中包括可持续发展的所有三个层面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些目标应激励个人和集体采取行动，并补充千年发展目标，同时应考虑到 2015 年之后的框架。秘书长应设立专家机制，以拟订并完善这些目标，然后提交联合国会员国通过。
49. 小组赞同秘书长的“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应毫不拖延地实施该倡议。
50. 秘书长应协同联合国有关机构、国际金融机构、私营部门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等有关国际组织的领袖，带头共同努力，定期编写全球可持续发展展望报告，汇集目前分散在不同机构的信息和评估，并以综合方式进行分析。
51. 各国政府和科学界应采取切实步骤，包括发起一项重大全球科学倡议，加强政策和科学之间的联系。这应包括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定期编写关于“行星界限”、“临界点”和“环境阈值”等概念的科学评估和汇编。这将补充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其他科研工作，包括经济和社会方面，以改进有关不平等问题等社会经济因素的数据和知识。此外，秘书长应考虑任命一名首席科学顾问，或成立一个具备广泛知识和经验的科学咨询委员会，负责向他或她和联合国其他机构提供咨询。
52. 各国政府应考虑成立全球可持续发展理事会，该理事会全年定期举行会议，以改善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的整合，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审查可持续发展的进展情况。该机构可以是大会的附属机构，取代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理事会将需要拥有具有广泛地理和政治代表性的成员，并吸引有关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以及来自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科学界的非国家行为体充分参与。
53. 该理事会应设立同侪审查机制，鼓励各国本着建设性精神，解释自身政策，分享经验和教训，并履行承诺。

54. 各国政府还应更积极地利用现有机构，包括利用举行里约+20 会议的 2012 年至 2015 年这段时间，审慎地进行审查和试验，以便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纳入 2015 年后的任何发展框架和体制改革当中。

55. 秘书长应加快制定联合国系统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加强协调一致性，更好地确定联合国各机构的职责，减少重叠和重复，加强对执行工作的问责。该战略应接受联合国所有有关机构和管理委员会的审查，并特别努力在共同参加所有委员会和进程的国家之间形成统一观点。

56. 秘书长应充分利用联合国作为世界会晤地点的优势，当领袖们聚集一堂参加新一届大会开幕会议的时候，定期召开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高级别交流。应利用这些会议，汇集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国际机构的负责人以及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制定议程，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附件二

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成员*

共同主席

塔里娅·哈洛宁 芬兰总统

雅各布·祖马 南非总统

其他成员(按英文姓氏字母排序)^a

谢赫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长

哈吉亚·阿米纳·祖贝尔 尼日利亚总统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前高级特别助理和顾问

阿里·巴巴詹 土耳其副总理

詹姆斯·劳伦斯·巴尔西利 加拿大国际管理创新中心理事会主席，“Research in Motion”公司前共同首席执行官

亚历山大·贝德里茨基 俄罗斯联邦总统顾问、气候问题特使和世界气象组织荣誉退休主席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 挪威前总理、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和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

米舍利娜·卡尔米-雷伊 瑞士前联邦主席兼外交部长

胡利娅·卡拉维阿斯·利略 墨西哥环境学家和前环境部长

古尼拉·卡尔松 瑞典国际发展合作部长

路易莎·迪亚斯·迪奥戈 莫桑比克议员和前总理

韩升洙 大韩民国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理事会主席和前总理

鸠山由纪夫 日本众议院议员和前首相

康尼·赫泽高 欧盟气候行动专员和丹麦前环境部长及前气候与能源部长

* 小组成员头衔为向秘书长提交报告时的头衔。小组成员以专家身份无偿参加工作。大多数小组成员自付了旅费。

^a 巴巴多斯第六任总理戴维·汤普森阁下在 2010 年 10 月 23 日猝逝之前一直担任委员会成员。

克里斯蒂娜·纳沃纳·鲁伊斯	西班牙议员、前常驻经合组织代表和前环境部长
杰拉姆·拉梅什	印度农村发展部长
苏珊·赖斯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美国总统内阁成员
陆克文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和前总理
弗罗因德尔·斯图亚特	巴巴多斯总理
伊莎贝拉·莫妮卡·维埃拉·特谢拉	巴西环境部长
郑国光	中国气象局局长
当然成员	
亚诺什·帕斯托尔	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执行秘书

附件三

工作范围*

背景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危机显示出自然环境在恶化，气候变化就是一个重要表现。我们已经达到甚至越来越多地超越了地球的界限。国家和多边层面不能商定果断和协调一致的行动，妨碍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社会经济目标的努力。这揭示了我们治理结构和过时发展模式的弱点，表明我们目前的做法存在局限，仍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没有解决具体症候的原因及彼此的相互关系。
2. 根据在 2009 年 9 月 22 日气候变化首脑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受气候变化与发展委员会编写的《缩小差距》报告的启发，秘书长决定成立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以研究这些问题。

范围

3. 小组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和提出可持续增长与繁荣的新理念及落实机制，将研究三组重要问题：
 - 3.1. 新的发展模式：
 - 如何实现低碳/绿色经济
 - 如何建立有复原力的经济，尤其是对最脆弱的经济体来讲
 - 如何消除贫困
 - 如何实现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 如何在一个限制碳排放的世界中实现发展
 - 3.2. 落实新的发展模式的机制，包括在全球和国家两级对体制架构和融资机制进行一切必要调整。
 - 3.3. 公共和私营实体在收集、整理、评估及披露有关数据和信息时做到透明，为落实上述模式创造有利条件。
4. 小组将特别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将其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研究其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的重要问题。小组将探讨和提出可持续增长和繁荣的新理念，评估气候变化的战略解决方案，以此为例作为管理全球问题/全球挑战的切入点。除气候变化之外，还可利用粮食、水和能源安全以及减贫等其他挑战来发展和验证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

* 本工作范围是秘书长潘基文在 2010 年 8 月启动小组时为小组规定的。

工作安排

小组

5. 秘书长将任命小组成员，包括共同主席。小组成员将以专家身份任职，向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小组成员将包括现任和卸任国家元首和内阁部长以及曾对探讨的问题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小组的成员构成将反映地理、能力、政治和性别的多样性。

秘书处

6. 将设置秘书处支持小组的工作。秘书长将任命秘书处主管，由其向秘书长负责，并与小组共同主席和成员密切合作。小组及其秘书处将向各国政府、政府间进程、联合国系统实体以及个人、民间社会组织和网络、学术界和私营部门广泛征询意见，收集信息和就小组的工作集思广益。小组应尽可能利用现有的咨询和知识共享机制与机会，但小组亦可酌情自行安排必要的会议和活动。

时间表

7. 小组将在 2011 年 12 月完成工作并发表报告。在此期间，小组将组织三次面对面的会议。另外还可通过电子方式组织互动，参加范围酌情确定。小组可设立工作组，由一或两名成员担任负责人，就具体议题编写材料供其审议。

8. 为外展目的，2012 年预计将保留一个缩小规模的秘书处延期工作 6 个月。小组成员个人也可在秘书处的支持下酌情尽量开展外展活动。201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以及会前进程将为推广成果提供非常难得的机遇。

成果文件

9. 小组将在最后报告中发表其分析和建议。在工作过程中，小组将建立讨论平台，为其工作产生投入。在小组存在期间，为促进其审议工作，可编写若干工作文件 and 政策简介，并在编好之后发表。

10. 鉴于小组特别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小组将其时间安排允许的情况下，努力编写其他政策简介，以最佳方式配合气候问题谈判进程。

附件四

筹备官员和顾问

塔里娅·哈洛宁

筹备官员: Hannu Kyröläinen

顾问: Ann-Marie Nyroos、Pekka Shemeikka

雅各布·祖马

筹备官员: Lindiwe Zulu

顾问: Judy Beaumont、Thembanani Mabandla

谢赫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

筹备官员: Sultan Al Jaber

顾问: Omar H. Shehadeh、Mohamed Abushabab 和 Aimee Elise Barnes

哈吉亚·阿米纳·祖贝尔

筹备官员: Adamu Emozozo

阿里·巴巴詹

筹备官员: Kemal Madenoğlu

顾问: Sema Bayazit、Sitki Ersin Esen

詹姆斯·劳伦斯·巴尔西利

筹备官员: David Runnalls

顾问: Paul Jenkins、Jordan B. Peterson、Simon Zadek

亚历山大·贝德里茨基

筹备官员: Dinara Gershinkova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

筹备官员: Marianne Loe

米舍利娜·卡尔米-雷伊

筹备官员: Peter Maurer、François Voeffray、Paul Seger

顾问: Thomas Heimgartner、Lorenz Kurtz

胡利娅·卡拉维阿斯·利略

筹备官员: Roberto Cabral、Germán González-Dávila

古尼拉·卡尔松

筹备官员: Torgny Holmgren

顾问: Ann Uustalu、Tove Skagerwall

路易莎·迪亚斯·迪奥戈

筹备官员: Fortunato Albrinho

顾问: Rogério Wamusse、Celmira da Silva、Egidio Domingo Fumo

韩升洙

筹备官员: Tae Yong Jung

顾问: Jihwan Park、Jin Young Kim

鸠山由纪夫

筹备官员: Kenji Hiramatsu、Shinsuke Sugiyama

顾问: Akiko Suzuki、Takuma Kajita、Naoko Ueda、Kohei Nakamura、Osamu Yamazaki

康尼·赫泽高

筹备官员: Michael Starbaek Christensen

顾问: Christian Friis Bach

克里斯蒂娜·纳沃纳·鲁伊斯

筹备官员: Eduardo Orteu

顾问: Javier Cachón

杰拉姆·拉梅什

筹备官员: Varad Pande

苏珊·赖斯

筹备官员: Elizabeth Cousens、Jonathan Pershing

顾问: Lynne Gadkowski、Corinne Graff、Hillary Schrenell

陆克文

筹备官员: Howard Bamsey

顾问: Benjamin Craig、Katy Lin

弗罗因德尔·斯图亚特

筹备官员: Selwin Hart

顾问: Keith Franklin、Travis Sinckler

伊莎贝拉·莫妮卡·维埃拉·特谢拉

筹备官员: André Corrêa do Lago

顾问: Fernando Antônio Lyrio Silva、Fernando Coimbra、Claudia de Borba
Maciel、Fernando de Azevedo Silva Perdigão

郑国光

筹备官员: 罗勇

顾问: 周波涛、胡婷

附件五

秘书处

工作人员

亚诺什·帕斯托尔(执行秘书)

乔治斯·科斯塔科斯(代理副执行秘书)

Christine Alfsen-Norodom

Julie-Ann Brown

Lee Cando

Maria Dada

Tanya Hogan

Clare Kane

Katell Le Goulven

Florian Lux

Tracy Raczek

Cynthia Scharf

Frank Schroeder

Celine Varin

Jin Zhang

(短期借调)

Salvano Briceño, 国际减少灾害战略机构间秘书处

Annika Savill, 联合国民主基金

Jana Simonova, 联合国人口基金

Youba Sokona, 非洲经济委员会

咨询人

John Drexhage

Alex Evans

Alex Kirby

Julie Larsen

Paul Raskin

Amy Ward

附件六

会议、有关协商和活动

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会议

- 第1次小组会议：2010年9月19日，纽约
- 第2次小组会议：2011年2月24日和25日，开普敦
- 第3次小组会议：2011年5月16日和17日，赫尔辛基
- 第4次小组会议：2011年9月18日和19日，纽约
- 第5次小组会议：2011年12月13日和14日，纽约
- 第6次小组会议：2012年1月11日和12日，纽约

筹备官员会议

- 第1次筹备官员会议：2010年10月20日和21日，纽约
- 第2次筹备官员会议：2011年1月23日至26日，布劳恩瓦尔德(瑞士)
- 第3次筹备官员会议：2011年2月23日和26日，开普敦
- 第4次筹备官员会议：2011年4月13日和14日，马德里
- 第5次筹备官员会议：2011年5月15日和18日，赫尔辛基
- 第6次筹备官员会议：2011年8月31日和9月1日，北京
- 第7次筹备官员会议：2011年9月17日和20日，纽约
- 第8次筹备官员会议：2011年10月23日和24日，纽约
- 第9次筹备官员会议：2011年11月18日至20日，波恩
- 第10次筹备官员会议：2011年12月12日和15日，纽约
- 第11次筹备官员会议：2012年1月10日、13日和14日，纽约

有关协商和活动

- 绿色增长专家会议，由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举办：2011年1月14日和15日，首尔
- 小组成员和联合国系统主管之间的协商：2011年1月27日，达沃斯
- 小组和会员国之间的非正式高级别对话，由大会主席召集：2011年3月16日，纽约
- 小组成员和联合国系统主管之间的会议：2011年3月16日，纽约

- 小组筹备官员和国际工会联合会之间的会议：2011年4月12日，马德里
- 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小组与最不发达国家关于绿色增长的协商：2011年5月10日，伊斯坦布尔
- 小组成员参加诺贝尔奖获得者研讨会：2011年5月18日，斯德哥尔摩
- 关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亚洲区域专家会议：2011年8月30日，北京
- 小组与民间社会代表的午餐会：2011年9月18日，纽约
- 小组与私营部门代表的午餐会：2011年9月19日，纽约
- 小组和会员国之间的高级别对话，由大会主席召集：2011年10月20日，纽约

鸣谢

秘书长的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成员诚挚感谢各国政府以及各组织、机构、联合国实体与个人在小组工作过程中提供了宝贵的观点、意见和支持。

小组还诚挚感谢丹麦、芬兰、德国、日本、挪威、瑞典、瑞士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政府以及欧洲联盟委员会捐助的资金。

小组也感谢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以及中国、芬兰、西班牙、南非、瑞士和土耳其等国政府捐助的实物。小组感谢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和 Open Text 提供平台以方便小组内部联络。

小组还感谢下列联合国系统实体向其借调专家并为其工作提供实务支持：

(a) 联合国系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全球契约”，全球粮食安全危机高级别工作队，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减灾战略机构间秘书处，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联络事务处，水和卫生咨询委员会，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银行；

(b) 其他组织和研究所：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国际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委员会，丹麦国际研究所，盖茨基金会，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全球碳项目，国际科学理事会，国际能源署，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斯德哥尔复原力中心，“大地”研究所，清华大学，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世界经济论坛和耶鲁大学。

小组还感谢民间组织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联络事务处协调组织的一系列协商中分享了宝贵的意见和观点。来自民间社会的所有参与者名单可查阅 www.un-ngls.org/gsp。小组还在若干会议上与下列组织的高级代表进行了互动：世界公民参与联盟，ETC 集团，全球气候行动运动，怀柔委员会，国际乐施会，利益攸关方论坛，“使美国可持续”组织和世界资源学会。

小组感谢若干专家提供的真知灼见和所做的贡献，包括：Paul Abberley, Susan Alzner, Per Pinstrup-Andersen, Margaret Arnold, Agnes Babugura, Tariq Banuri, Manish Bapna, Amber Barth, Jose Maria Batanero, Zachary Bleicher, Borge Brende, Gordon Brown, Jonathan Chan, John Christensen, Ian Christoplos, Sara Cook 及其团队, Angela Cropper, Fulvio Conti, Olivier de Schutter, Shobhakar Dhakal, Ani DiFranco, Felix Dodds, Warren Evans, Scott Foster, Ricardo Fuentes, Owen Gaffney, Kyle Gracey, Nathalie Girouard, Francois

Guerquin 及其团队, Jose Miguel Guzman, Helmut Haberl, Navid Hanif, Elliott Harris, Peter Hazlewood, Jeremy Hobbs, Charles Holliday, Ellen Houston, Jesus Abadia Ibañez, John Ingram, Maria Ivanova, Bruce Jenks, Bruce Jones, Asad Khan, Jeni Klugman, Georg Kell 及其团队, Randall Krantz, Maria Fischer Kowalski, Debra Lavoy, Julia Marton-Lefevre 及其团队, Gregory Mock, Selim Louafi, Edward Luck, Jim MacNeill, Josefina Maestu, Khalid Malik 及其团队, Karin Manente, Luis Jimenez-McInnis, Pat Mooney, Alexander Mueller, Deborah Murphy, David Nabarro 及其团队, Sunita Narain, Joaquin Nieto, Kevin Noone, Jeremy Oppenheim, Elinor Ostrom, Robert Orr, Aurelio Parisotto, Jan Peterson, Marina Ploutakhina, Andrew Revkin, Kelly Rigg, Johan Rockström, Richard Rosen, Anabella Rosenberg, Daniel Schensul, Nikhil Seth, Rita Sharma, Daniel Shepard, Surendra Shrestha, Christine Eibs Singer, Mark Stafford Smith, David Steven, Ingrid Srinath, Minoru Takada, John Talberth, Simon Upton, Jason Varmazis 及其团队, Tom Weiss, Annie Wu, Sven Wunder, Simon Zadekh 和沙祖康及其团队。

最后, 小组成员感谢其筹备官员和顾问在编写报告过程中自始至终的敬业和严谨精神。小组还感谢亚诺什·帕斯托尔领导的小组秘书处提供的实务和行政支持与投入。

小组诚挚地感谢所有这些贡献与支持。
